

戰時小叢刊之二十五，第八路軍的根據地

# 西北新社會

史 諾 等 著



劉波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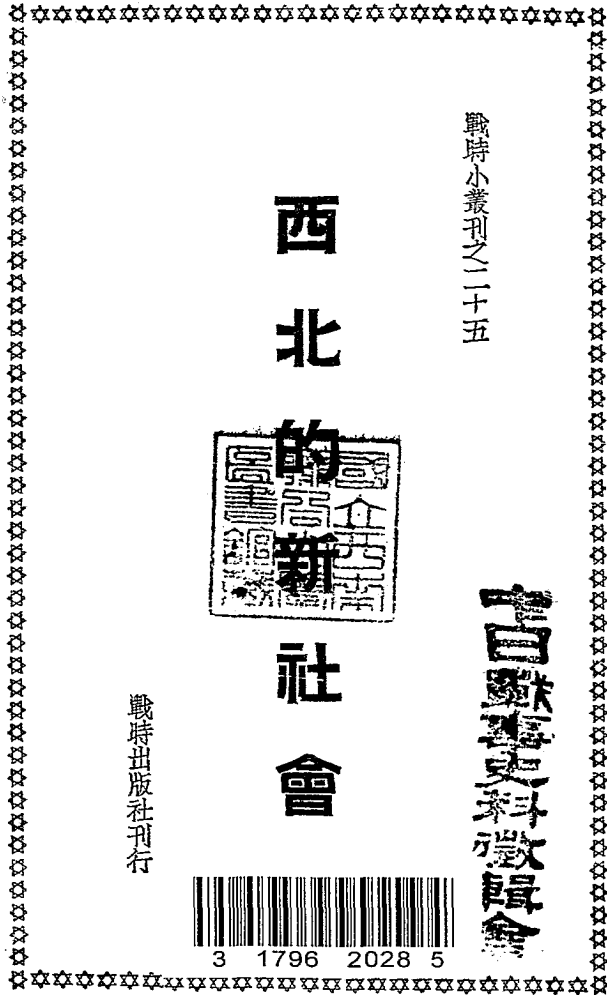
戰時出版社出版

3277

MG

K2695

9



戰時小叢刊之二十五

西北的新社會



青島歷史科徵解會

戰時出版社刊行



3 1796 2028 5

# 目次

陝北目前的實況	一
陝北新社會	五
陝北的生活	一六
陝北的紅軍	二四
陝北的法庭	四三
陝北的文藝	四九
陝北的劇社	五三
膚施的話劇與活報	六〇
陝北的工業	六九
陝北行中之印象	七四
共產黨與西北	八九

## 陝北目前的實況

陝北這個地方，是中華民族的發源地，是我國西北的門戶，前代防胡的重鎮。可是因為時代環境的變遷，當地經濟文化的衰落，以及民國以後，國內戰爭的頻仍，天災人禍的流行，軍閥官僚的壓迫，苛捐雜稅的繁重，遂使這個交通阻梗而多山的陝北，成爲一個烏烟瘴氣而異常落後的區域。在數年之前，國人對陝北大都認爲盜匪橫行，鴉片遍地，野蠻可怕之區。即使有人提起榆林和延安，也不過是說：那是到甯夏和青海去的大道罷了。

自劉志丹在保安一帶進行蘇維埃運動之後，陝北的情形，就起了劇烈的變化。他提出具體切實的口號，針對着當地人民的苦痛，號召他們起來反對豪紳土劣的剝削和壓迫。於是蘇維埃區日漸擴大，而一向被國人所遺忘了的陝北，也加以稍稍的注意了。

一九三五年秋，徐海東率領紅軍自陝南越秦嶺，經隴東至陝北與劉志丹匯合之後，國人對於陝北就加以異樣的重視。特別是毛澤東、朱德以及中國共產黨與中華蘇維埃政府諸領袖和二徐相會以後，陝北就成爲特別緊張的局面，抗日救亡的呼聲，震動了全國。當時駐防陝北的紅軍，有十萬人以上，中國共產黨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都在陝北，并在保安、定安、延安一帶，實行土地分配、教育文化、經濟建設、組織民衆等等，都在積極進行。所以國人都說：陝北已變成江西第二了。

事實上，陝北在數年之前，自劉志丹開始作民衆解放運動的宣傳之後，一般民衆對於抗日救亡工作，已有相當的認識。蘇維埃區域日漸擴大。自紅軍總匯合以後，陝北一帶的蘇維埃區域，更加擴大起來，而由共產黨所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也蓬勃而起了。但是中國共產黨自紅軍在陝北會師以來，曾向南京中央政府提出要求：停止進攻紅軍，一致抗日，並於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出師山西，願與日本帝國主義決戰。不幸當時共產黨的主張，未被南京政府所採納，紅軍不得已由山西回師。紅軍出師山西，志在抗日，絕無地盤成見。『中國共產黨從九一八事變起，特別在一九三五年華北事件之後，早已把日本帝國主義當做了中國民族的最大敵人，把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收復東北的失地，當做了我們的中心任務。』（洛甫）

數年來中國共產黨與蘇維埃中央政府爲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和解放，作了許多艱難困苦的鬥爭，并號召全國各黨各派與全國同胞組織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爲實現此種主張起見，『共產黨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後，即提出了「全中國人民自動武裝起來，開展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的口號，并爲反對日寇佔領東三省，進行了廣大的羣衆的抗日救國運動。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戰爭之後，蘇維埃中央政府於同年四月，即發表了對日宣戰的通電與緊急動員令。一九三三年正月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即發表通電，願意在三個條件之下（即（一）停止進攻蘇維埃區與紅軍，（二）保障民主權利，（三）武

裝民衆，創立抗日義勇軍）同任何國民黨軍隊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當華北危急，中國共產黨與蘇維埃政府發表了一九三五年的「八一宣言」，號召全國人民不分階級，不分黨派，創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收復東北失地。同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十二月決議，更加詳盡地規定了黨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一九三六年八月，中國共產黨又發表了致國民黨書，要求在抗日救國的總目標下，實行「國共合作」，並於九月提出爲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而奮鬥的任務。（洛甫）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當國民黨三中全會的前夜，中國共產黨中央爲了具體的建立統一戰線，乃以一個系統的具體建設通知該會，這個通知用一個電報發出。在這個電報內，要求國民黨向共產黨保證停止內戰，民主自由，國民大會迅速準備抗戰，及改良人民生活等五項。共產黨亦向國民黨保證取消兩個政權對立，蘇區紅軍改名，實行民主政治，及停止沒收土地等四項。（毛澤東）「一三一」上海戰事爆發之後，中國共產黨即於八月十五日發表抗日救國的十大綱領，即：（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二）全國軍事總動員；（三）全國人民總動員；（四）改革政治機構；（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後方；（十）抗日的民族團結。這是中國共產黨自「九一八」以後，直至目前爲止，號召全國民衆一致抗日，完成統一的民族解放戰爭而奮鬥的一貫主張。

現在陝北一帶的政治、經濟，以及教育文化各方面，都是依據這一貫的主張而實行的。

那末，目前陝北的實況究屬如何？它和過去有什麼不同之處？概括地說，陝北目前的一切，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向着抗日救國的總目標之下邁進了，在政治上根據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陝北各縣各區的上下行政長官，已在實行自下而上的民主的選舉制；在經濟上，因為陝北一帶向來是個落後區域，工商業極不發達，故目前特別加強合作社的領導，擴大合作社的貿易，擴充合作社的基金，推廣合作社的範圍，藉以振興工商；在教育文化上，以興建學校與社會教育為原則，並採取「小先生」教育制，以推廣教育在延安一地，自今年春間「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成立之後，全國各地去肄業的學生，有三千餘人。最近剛成立的「陝北公學」，學生就有數百人以上。這兩所學校為培植抗日的青年幹部起見，已聘請素為全國青年所信仰的專家和各教授數百人，分別担任各項課程。延安的新中華報與解放週刊經常對民衆作具體正確的消息的報道，和抗日救國理論的分析。行政機關和公共場的牆壁上，都貼着抗日的壁報、標語以及改善人民日常生活的口號。在延安有大規模的山圖書館、戲院、運動場等等的設立。流動劇團時常到農中去排演活報，進行社會教育。至於對民衆方面，則積極扶植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保障人民的出版和言論自由。減租、減息、減賦和救濟失業諸種事宜，都在積極進行。過去一切派餉、攤糧、拉伕等等壓迫人民的方法，完全掃除了。各種社會團體——工會、農會、婦女會等，正像雨後春筍似的成立起來。陝北定邊、靖邊、橫山、榆林、神木及府谷數縣向來是

漢、蒙、回三種民族雜處的地方。蒙、回兩種民族，因受共產黨宣傳的結果，深知非和漢族團結，一致抗禦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就不能解除他們切身的要求與痛苦。故自全面抗戰開始後，陝北蒙、回兩大民族的抗戰情緒，非常高漲，如遠在陝北定邊的回民，已於九月間成立「救國會」，要求赴前線去和日本鬼拚命。所以在日寇積極滅亡中國的軍事進攻之下，陝北一帶的蒙、回也漸漸地覺醒起來，願為中國之自由、獨立與解放而鬪爭。

陝北目前這一切新動態，不僅陝西全省從來所未有的現象，即號稱經濟文化發展的東南各地，也不能和它相比較的。是的，陝北目前的實況，特別是延安，已經成為中華民族解放的熔爐，為民主、自由而鬪爭的火燄，正在燃燒；這種光芒萬丈的火燄，必然要照耀到中華民國整個領土，焚毀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的野心。還有誰說目前的陝北，是一個落後的區域呢！（林克多）

## 陝北新社會

### 建設綱領和一般組織

一般概況 且不說共產主義在中國南部所曾表現的成績如何，單就我在西北所看到的情形而論，確實可算是實行了農村社會的平等。這種情形在經濟方面表現得最為顯著。但是，在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等部門，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還不夠充份，而物質條件的種種限制更是隨處可見。在這區



域裏，機器工業簡直是談不到，較之中國東部所受工業化的影響，真不可同日而語。雖然種種經濟方面的腐蝕情形，足以反映若干半工業化城市的經濟變革。但在西北，主要的生產方式還是耕種和畜牧，數世紀來它的文化都在停滯狀態中。但紅軍本身則確實是在中國工業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特殊產物。隨着紅軍而導入的種種新思想的刺激，對於陳舊的西北文化實然是一種革命。

**建設綱領** 由於現實環境的限制，使紅軍對初期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除了着手於政治體制的建立外，不能有所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得等他們將來能握得大城市的政權以後。因為在大城市裏，已經有着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工業基礎，因此可以把它們隨手取過來，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所以現在，紅軍在西北農業區域裏面的主要活動，祇能集中努力為當前亟切的農民問題——土地和租稅——謀得解決。這政策似乎帶着反動的色彩，其實不然。中國共產黨認為土地分配政策祇是建立民衆基礎的一種步驟，目的在鼓勵民衆積極努力，以奪取政權和獲得徹底的社會主義變革的最終實現。——在這過程中，集體化將成必然的趨勢。在馬丁勞倫斯 (Martin Lawrence) 所著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根本法 (Fundamental Laws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一九三四年倫敦出版) 一書中，曾有這樣的記載：一九三一年舉行的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對於中國共產黨最大限度的工作綱領有着詳細的規定，在那綱領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目的，是在建設真正徹底的馬——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但在同時，我們必須曉得，所

有蘇區裏的社會、政治、經濟等的組織，自始就都是臨時性質的，就是他們在江西的時候也是如此。因為他們最要緊的是先得努力奮鬥以爭取本身的存在。所以他們的主要工作，倒不是想謀共產主義得在中國實驗，而是在努力於建立一種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基礎，使得革命事業能夠得到廣泛和深入的發展。有些人以為紅軍正在那麼一個小小的被封鎖的區域裏實驗着共產主義，這想法實很幼稚。

經濟改革 很顯然地，在蘇區裏面，紅軍的所以得到擁護，並不是因為他們抱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主張；或是抱着孫中山先生所說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紅軍所實現的最值得稱道而為農民謀福利的為下列四項：（一）土地的重新分配；（二）高利貸制度的取消；（三）苛捐雜稅的取消；和（四）特權階級的廢除。

階級劃分 在理論上，蘇維埃的政府是應該同時包括工人和農民的。但事實上，差不多全部選民都是農民，因此政治體制當然也和這種特質相應着。當局想把農民間勢力的高下，設法使之平衡，因此把農村裏的民衆區分做下列幾種階級：（一）大地主；（二）中小地主；（三）富農；（四）中農；（五）貧農；（六）佃農；（七）雇農；（八）手工業勞動者；（九）流氓無產階級；以及（十）那些被視為農村知識分子的像教師、醫生、技術人員之類的自由職業者。這種區分，一方面是政治的，一方面當然也是經濟的。他們使得在實行蘇維埃選舉時，佃農、雇農和手工業勞動者之類的勤苦大

衆比較那些富有者可推舉更多的代表，這種目的顯然的在造成某種性質的農村無產階級的民主專政。但是，在那種被劃分的階級裏面，我們却很難看出他們在根性上有什麼重要區別，因為它們都是直接和農村經濟發生關係的。

選舉權利 在那些政治體制穩固的區域裏面，蘇維埃的工作很有成績。代議政府的機構是以鄉蘇維埃爲小單位，在這上面，有區、縣、省，以至於中央蘇維埃。每一鄉都得選舉它的代表出席較高的蘇維埃，這樣一直到全蘇大會。十六歲以上的民衆有普遍的選舉權，但這種選舉權是並不平等的，理由已在前面說過。

各種委員會 當紅軍佔領一地之後，就立刻舉行熱烈的選舉運動：隨即召開民衆大會，產生一個被稱爲革命委員會的全權委員會。這委員會和共產黨保持着密切的聯絡，並且負責辦理初選或複選工作。在每一蘇區之下由它任命的委員會有：教育、合作、軍訓、政訓、土地、公衆衛生、游擊訓練、革命防衛、擴大紅軍、農村互助、紅軍耕種等等。這類委員會在各級地方蘇維埃以至中央蘇維埃都有。但政策的調節以及國家大計的決定，則都由中央蘇維埃主持。

民衆組織 共產黨的民衆組織工作並不僅限於政府本身，在各鎮各鄉的農民和勞動者中，就有着廣泛的黨員。此外，並且把大多數的青年羣衆組織起來，編成「少年先鋒隊」和「兒童團」。共產黨並且把婦女大衆，也分別編制在共產黨青年團、抗日會、看護學校、和紡織學校、婦女耕種隊等組

織裏面。成年的農民則分別編制在貧民會和各種反日團體裏面。甚至那些從來是盜匪組織的「哥老會」之類，也把他們蘇維埃化，而給以公開和合法工作的機會。此外，爲農民隊、遊擊隊，都在農村政治社會組織裏面佔着重要的地位。

黨的指導 上述許多組織和各種委員會的工作，都同時受着中央蘇維埃政府、共產黨和紅軍的指導。雖然那些團體的發起組織、徵求會員、策劃工作等，似乎都由農民本身用民主的方式加以決定，但是都受着黨員們的直接指導，而使各種團體相互之間保持着密切而有機的聯繫。這種蘇維埃組織的目的，顯然是要使每一個成年男女和兒童都成爲相當的組織中的一員，而從事於被指派的固定工作。

#### 怎樣動員民衆和得到他們擁護

春耕運動 蘇區裏面對於增加生產和利用荒地所取的方法和種種努力，頗見成效。我會搜集得許多由土地委員會分發到各支部去指導它們怎樣宣傳和組織民衆以從事於墾植工作的命令。這種命令的內容，看來廣泛得使「驚奇」却都是些合乎常識而有實踐性的東西。我在某土地委員會的支部裏會看到一條關於「春耕」的命令，內容是督促那些工作人員，不取任何強迫的方式，用廣大的宣傳，誘導農民們自動地來參加春耕。在早一年的冬天，當局就決定了如何在這春耕時期必須達到的四種要求的詳細規劃：（一）更廣泛的利用荒地和擴大紅軍的耕田；（二）增進農作物生

產(三)使農作物時常換種耕植，特別注重於蔬菜和瓜類的換種耕植；(四)推廣棉花耕田。

動員婦女老弱 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土地委員會所頒佈的命令中，對於如何增加勞動力量，尤其是如何使婦女們直接參加農業生產（特別是那些因參加紅軍而男子人數驟形減少的區域裏面）的辦法會有詳細的規定。其中有一段規定得頗為卓越而有趣，由此可見紅軍對於每一種有利的條件，都在儘量地利用着。這一段的規定是：

「動員所有的婦女和老幼，一起參加春耕運動。按照各人的能力，使他們在生產過程中分別担任繁重或輕便的工作。譬如說：天足的和年輕的女子，應該把她們組織成各種生產教導隊，並且分別担任清除耕田以至於農業生產的主要工作。至於纏脚的女子，以及老者和孩童，則應該使他們幫同佈種、拾糞，以及其他種種輕便的輔助工作。」

民衆的感覺 但是，農民們本身對於這種種設施有着怎樣的感覺呢？一般人總以為，中國的農民是反對組織、紀律，以及家庭以外的種種社會活動的。可是，假如你真要抱着這樣的念頭，紅軍們對你祇有發笑。紅軍深信，假如農民們是在為他們自己而不是為了民團、地主或稅吏們在工作着，那麼誰都不會反對組織的。同時，我必得承認，凡和我交談過的農民，多半是擁護蘇維埃和紅軍的。當然，也有許多農民對於蘇維埃和紅軍很自由地作着種種的批評和指摘，但是假如問他們：「你現在過的日子是否比以前的好呢？」那麼，他們的答覆幾乎都是肯定的「是的！」我並且很注意到大多數的

農民，當他們提到「蘇維埃」時，總稱做「我們的政府。」在中國的農村裏居然有這種現象，無疑地很使我感到驚奇的。

民衆武力 紅軍在民衆中有着根深的基础。在那些建立較久的蘇區裏面，地方上的警衛和治安的維持，幾乎完全交給農民們的組織去負責。蘇區內部很少真正的紅軍，全部的戰鬥力量都在前線。地方上的防衛工作由鄉村革命防衛團，農民赤衛團和遊擊隊員分担着。這種事實，足以說明紅軍之所以被農民大衆所擁護，因為他們並不像其他軍隊一樣把農民們當做剝削和生利的工具，他們却常是在前線和敵人奮鬥，以博取食糧。同時，農民們也都有着嚴密的組織，鞏固後方，而使紅軍得充份活動，無後顧之憂。

民衆擁護的原因 但是，我們必須深切了解，共產黨員活動之所以得到農民擁護，是有着經濟上的基礎的。西北農民過去所肩負着的像賦稅、地稅、徭役等等，現在都一概取消。紅軍到達一地，無疑地給予那些佃農、貧農、中農，以及所有那些赤貧的人的環境一種急劇的變革！（一）在紅軍第一年佔據的區域裏面各種賦稅全部取消，使得農民們可以透過氣來，蘇息一下。在建立較久的蘇區裏面，則對於土地徵收一種累進稅，對於商業徵收一種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單一稅；（二）其次，對於那些無地可耕的人分給他們田地，同時把那些廣大的沒有地主或地主已經逃走的「荒地」加以開墾；（三）最後，他們把那些富有者的田地和傢俱加以沒收，而分配給那些貧窮的人。

## 土地政策的理論和實踐

沒收和再分配 土地再分配原來是共黨的根本政策。後來，爲着政治上的策略關係，對於蘇維埃土地政策就作了極大的讓步。但當我在西北旅行時，那時實行着土地法（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西北蘇維埃政府所頒佈）規定着：凡地主和富農的田地，假如他們自己不耕種，都得一律沒收。他們所能佔有的祇是他們能用自己的勞力耕種的田地。但在事實上，西北很多地方並不感到田地的缺少，因此那些地方，假如地主和富農們不離開他們的田地，那麼那些田地就不會被沒收，祇有那些無主的田地才被加以分配。但有時，對於那些質地良好的田地，要重行劃分，使貧農們可以得到較好的田地，而地主們却祇能分配得同樣數量劣質的田地。

地主和貧農 怎樣才算是一個地主呢？根據共產黨員們的定義，簡單地說凡是不靠自己的勞力而靠租田給別人以獲得收入的農民都是地主。根據這個定義，那些土豪和高利貸者就都得算做地主，而應該受到同樣的待遇。根據國際會史丹祿博士 Dr. Stampar 的調查，在過去，中國西北一帶的利率率至竟高到百分之六十，在發生災禍的時候，當然更高。在甘肅，陝西，甯夏等省的地價，大多數是非常便宜，但是一個赤手空拳的農村勞動者或是佃農，要想積蓄起錢來買進一塊足夠他家用的田地，那簡直是夢想。我在蘇區裏碰到一個農民，他過去就從來沒有能力去買進一塊田地，雖然那時有好多地方田地只有二三塊錢一畝。

土地政策的目的 除了上面所述的那些富有階級的田地要被充公外，大多數的農民當然立刻享到這種土地再分配的利益，那些貧農佃農，以及雇農都有着足夠的田地，可以維持生計。蘇區裏面似乎並沒有意思使每個人佔有同樣數量的土地，據王冠蘭（譯音）（二十九歲，俄國留學生，任西北三省蘇區土地委員。）向我說明，蘇維埃土地法的主要目的是在使得每一個人都有足夠的土地去養活他和他的家屬。而這正是農民大眾們所最迫切的要求。

對農民的利益 在西北土地問題——沒收和再分配——可以說是非常的簡單，因為在過去那些大的田產都被官僚、稅吏和離開本地的地主們所佔有，現在祇要把那些地產充公，就能滿足貧農們的迫切要求。因此，對於那些留在本地的小地主和富農們，就可不必怎樣的苛求了。所以，紅軍的造成經濟基礎，不但由於貧窮和無地可耕的農民們因為分得了田地而擁護他們，而且在若干場合中，因為消滅了賦稅的剝削，很使貧農們感激他們。更以同樣的理由或是由於反日運動的號召，甚至獲得了若干小地主的擁護，在陝西，有幾位共黨要人，他們就出身於地主的家庭。

特別幫助貧農 對於貧農更給以特別的幫助，放給他們很低利息甚至不消利息的借款。高利貸制度完全取消，但私人間的借貸關係，假如年利不超過一分，是被准許的。蘇維埃政府規定的借款利息普通是五厘。兵工廠裏製造出來好幾千農具和鉅量的穀種，供給於這些無地可耕的農民，幫助他們去開墾荒地。



農事教育 蘇區裏正建立了一所初級農業學校。並且據說，祇要能從上海方面請到一位專家，就預備立刻開辦一所畜牧農政學校。

### 合作運動和文化生活

合作運動 合作運動的推進，非常積極。除了生產和分配的合作外，並且有着許多在中國尙屬罕見的合作方式，譬如像畜類和農具的集體應用——特別是公共農場，紅軍農場內——以及勞作互助會等組織，後者更促成許多面積廣大的田地，都能很迅速的耕種和收穫，而農民在個別勞作時的那種時間上的浪費，自然是消滅了。在農作忙碌的時期中，就採用「星期六突擊隊」的制度，其時不但是全部的兒童組織，甚至所有的蘇維埃官吏，共產黨員，赤衛軍，婦女組織，以及駐在鄰近的紅軍部隊，都一致動員起來，每星期至少要有一天耕作。就連毛澤東也參加這種工作。

集體努力 紅軍就利用這一種機會，宣傳那種「集體努力」的革命思想，同時給農民以假定「集體化」能一旦實現時所需的教育工作。同時，由於一般農民們性情的孤僻，所以就設法逐漸灌輸給他們一種在廣泛的社會生活的觀念。在農民中間所建立的組織，紅軍稱它們做三位一體，因為它們同時具有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實效的三種性質。

文化水準 紅軍對於提高民衆文化程度度的工作，用西洋的標準來衡量，自不足觀。但是，在中國其餘部份流行着的種種非常罪惡行爲，在歷史較長的西北蘇區裏面，確實是完全消滅了，而在新的

蘇區裏面，大規模的宣傳運動，在民衆中間展開着，以期達到同樣的初步改革。在陝北鴉片已完全禁絕，這尤其可以算得是極大的成就。在我走進蘇區以後確實沒有見着過有一處種植粟花的，官吏的貪污事件簡直從來沒有聽得過。求乞和失業的現象，正如紅軍所宣稱，現已完全消除。我在蘇區旅行時，從沒有看見過一個乞丐。纏腳和殺嬰，都被視爲犯罪行爲，童奴和娼妓制度不復再見，一妻多夫制和一夫多妻制也完全禁止。

結婚制度 那種「公妻」或「婦女國有」的荒誕不經的傳說，真是毫無根據。但婚姻制度則確有改革，離婚和承繼權的規定，當然和中國任何其他部分的那些半封建法律和實際情形是極端不同的。在一九三六年再版發行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The Marriage Law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裏面，有若干條文是非常有趣的。譬如說，姑婆虐待媳婦，買賣婦女作爲妻妾，以及父母包辦婚姻等制度，都一概禁止。婚姻必須由於雙方本人同意。法定結婚年齡，男子必須達二十歲，女子必須達十八歲。嫁奩制度，完全禁止。男女雙方假如同意，祇須向縣、市或鄉蘇維埃登記，就可不費分文，取得結婚證書。男女雙方祇須事實上已同居，不管他們有否登記過，都算做合法，他們所生的子女當然也是合法的，所謂私生子是根本沒有的。

離婚制度 至於離婚，祇須任何一方對婚姻的不滿意而提出要求，就可不要分文取得登記處的許可。但是紅軍的妻子要提出離婚，那必須先得對方的同意，才能獲得許可。至於財產，則由離婚雙

方互相均分，即對於子女，在法律上雙方都有贍養的義務，但假如有債務，則規定必須男子一方負擔（！）同時男子必須負責供給子女生活費用的三分之一。

民衆教育 教育，在理論上說來，除了子女的衣食由父母供給外，當然是免費和普及的，但實際上，免費和普及的教育，却還不能達到怎樣的成就。據教育委員徐特立（譯音）向我說：當紅軍初抵西北時，百分之九十九的民衆是文盲，但現在却已事實證明，祇要有機會給農民，他們是非常願意學習的。他們並不愚蠢。他們學習起來非常快。祇要用好的理由給他們解說，他們那種不健全的迷信的習俗，立刻會改變。而教育本身，就當担起這任務來。當成年的農民，像他們的子女一樣，學完了五六百字的第一冊書以後，是不願意就此停止學習的。他們很清楚：誰在教育他們，和爲什麼教育他們。由於教育的結果，他們對於中國共產主義的基本戰鬥意識，當然是緊緊地把握住了。（Edgar Snow）

## 陝北的生活

### 政治人員的生活

蘇區裏面政治軍事機關人員的生活，其朴素之程度，比我們所想像的還遠得多。無論毛澤東朱德，或是一個下級的工作人員或士兵，他們或她們都是一套制服，一條橫的束腰皮帶（沒有「三角帶」）一頂制帽，上面有一顆五角形的紅星。他們每日的食費，一律是一角五分的菜錢，他們的津金，

自毛澤東至下層政治人員，一律都是每月三塊錢。奇怪的是這三塊錢他們往往還花不完，常把剩下的資助公共的用費。

更奇怪的是他們在這樣清苦的物質生活中，大家都是興高采烈，像毛澤東，六十多歲的教育部長徐特立等人，吃得很結實強壯，從前在外面聽說他們「面黃饑瘦」，也有點覺得是很可能的，然而現在一看，纔知道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毛澤東的事務，恐怕是最繁最多了。他每晚總要到兩點鐘纔睡覺。他在白天是不能計劃重大的策略的，因為他必須到處演講、視察、接客、見同志。如果有重大的事情要和他商量，他會請你到晚上十二點鐘以後晤面，因為那時他纔能在靜一點的室裏，運用那敏銳獨到的周密的思考，在夜間接觸客人和同志完畢後，他纔能用一兩個鐘頭，把日間的一切，加以思考、研究和聰明的決定。

有一次，毛澤東帶我去看一處民衆娛樂會，我們一路說說笑笑地走到門口，守門的售票員向他敬禮後，毫無客氣地向他索取一角錢的門票，我身上已先有送來的一張，毛澤東卻不能不翻身去買票，後纔能進來。像這樣不分高低的嚴厲的辦事精神，我還是在蘇區裏纔看到的。不過他們對於領袖不見沒有崇敬之心，我們進了場內，許多人們都紛紛站起身來，讓前面的位子給毛澤東坐。

最令人吃驚的是那種黨的組織的民主精神。不論是毛澤東或朱德的護兵，他們同樣是黨員，同樣要經常開小組會，討論政治，討論政策。還有他們裏面流行着一句口號，就是把空閒的每一分鐘來

讀書，他們把讀書看成很重要的工作。

在維持治安的保安隊（從前叫赤衛隊）外，還有一種特務的，是政治警察的性質，他們有權利檢查一切的路人，到蘇區去的客人，如果一時高興，不穿外面穿來的普通衣服，而換上了他們的制服，那麼一定要大大地倒霉的。特務隊對於穿普通的外面的衣服的人，知道是客人，所以並不檢查，反而要負責指導招待，但對於穿他們制服的人，只要他們覺得面生，就非嚴厲檢查不可。他們裏面的人員都有一張證書，寫得非常詳細，沒有這證書，那管你三七二十一，抓起來到一切水落石出時纔能自由。大概特務隊是專門對待奸細的。

#### 爲了工作和人民

他們的生活那樣節省清苦，可是爲了工作和人民，他們的花錢又使人吃驚！

他們自己每人一天是一角五分的伙食，然而對於外面的客人，他們卻供給了一天一元五角的一伙食！我想，也許是他們不願客人回去後說他們的生活壞得很，纔有此舉罷？但據後來的調查，可並不是這樣。他們不但對客人是這樣，就對從異地（蘇區外的）同志，也一樣招待。他們說因爲從異地來的客人或同志，都是辛苦得很，所以必須讓其休養些。我離開膚施那天，毛澤東就大請我們一頓，花了二十幾塊錢。

從膚施那裏到西安去，路途很遠，如果是坐汽車，每輛須有二百元左右的汽油費和其他雜費。

（汽油在那裏很貴。）但如果是重要的工作人員，他們是不惜一切的開汽車的。

又那裏的農民，缺乏鐵鋤農具，儘管那些東西很便宜，他們總要用汽車到西安來買。運費往往比貨物貴得驚人，但他們卻是那樣毫不介意。

那兒的山和我們常見的山是不同的。我們所見的山，山下總有平地；但那兒是前後左右，山根和山根相接，沒有平地的。農民們的種作，只得在山坡和山上關地而耕。因此灌溉非常困難。但政府也常花了許多錢來解決這些問題。

還有是遊藝和娛樂，差不多是時常有的。演劇時的服裝，完全和他們平日的簡樸相反，無論什麼時髦的服裝，都購置齊備。戲劇多是以抗日為主題，有朝鮮、印度、臺灣、蒙古各地方的人上臺唱各地的歌和演技。

#### 統一戰線委員會及教育

蘇區裏現有一「統一戰線委員會」，由周恩來任主席，專管對外聯絡及統一戰線策略的。現在國共的合作各種談判，主要的都是周氏自己出馬。

舊紅軍大學，現改為抗日紅軍大學，由林彪任校長。這間大學的設備很樸素，學生有的連褲子都沒有。上課時把筆記書本擱在膝上讀書。第一期招生限五百人，但報名的有二千多人，此外北平、上海還有一千多人想進去，經拍電告滿始止。抗日紅軍大學的功課全是關於中日問題，戰爭問題的。這裏

有百多名內蒙的青年，他們將是抗日的幹部。該校全不授階級鬥爭的理論。

黨校和抗日紅軍大學分別得很清楚。黨校就完全是研究共產主義的，該校的目的係在造就黨務人材。

此外還有「魯迅青年學校」，是高等小學性質。蘇區裏的小學程度很高，在小學中就授以初步的代數、幾何和一般科學基礎知識。他們的教授法也不是抽象的講述，而是用具體的實例，很有興趣地啓導學生的。

因為教育的認真和普遍，所以蘇區裏有許多新的科學上的發明。軍器上的不用說了，就是油印的蠟紙等等，他們都會自己製造。

### 結婚的容易和困難

蘇區的婚姻，平時在外頭聽說很隨便，實際上是很麻煩的。凡要結婚者須向當地機關報告，如果是黨員，就由黨部調查；如果不是黨員，就由當地行政機關調查。首先是注意政治關係，思想等等；其次是由醫生檢驗生理，凡有患規定的禁止結婚的疾病，概不准結婚；第三，還要調查雙方有無其他戀人，因為他們是嚴格地進行一夫一妻制的。

離婚的手續也很容易，如果雙方同意，就到行政機關陳明理由完事。如果是一方同意，一方不同意的話，那就要經嚴密的考察，倘如發現一方有不負責的行動，便要懲罰的。

## 抗日紅軍

現在在西北的抗日紅軍，計有三方面，即朱（德）、賀（龍）、徐（向前）。據宣傳有三十萬以上的人數，但這是連保安隊、童子團和一切後備力量算在內的。正式的戰鬥軍隊大約在十萬以上。

第一方面軍是朱德率領的。包含一、三、五這三個軍團。爲什麼要這樣結合呢？因爲這是根據各軍團的戰鬥特長而決定的。一個軍團是長於遭遇戰的，無論什麼時候，一遇到敵人馬上能以極大的破壞力量去殲滅牠。另一個軍團是長於陣地戰的，這是在某種環境，能作攻性的守，運用正面的陣地戰術，以擊退敵人。還有一個軍團是長於遊擊戰的，能用神出鬼沒的戰術，以牽制和打擊敵人。把這各有特長的三個軍團配合起來，予以統一的指揮便成爲一種所向無敵的戰鬥力量。這第一方面軍，就是紅軍的中央軍。自其成立至今，經數十次大小戰鬥，沒有一次失利過。

其他賀、徐兩方面的軍隊，也是同樣就特長而配合成的。

除了政治訓練外，紅軍的軍事訓練不注意操場的動作。因爲他們以爲操場上的動作是形式上的訓練，太枯燥和不切實際。所以他們的操練，是注意實際戰鬥的訓練。這也是很特別的訓練法。

## 西安事變餘談

我們在裏面事情完畢後，便到西安去。

據毛澤東說，去年雙十二事發時，他們接到第一封電報很懷疑是電報生弄錯了，他們不相信和



紅軍已有一年的關係的東北軍將領，會那樣不理解共產黨的統一戰線的政策，而作那分裂中國危害自身勢力的幼稚的冒險。可是在同天他們接連的收到三四封類似的電報，於是不能不相信了，連忙派代表到西安去。

其實西安事件的發生，不但紅軍方面事無所聞，就是張學良和楊虎城在十二月十一號以前，也自己沒有想到的。這事的發生，是因為西安學生紀念十二月九日的北平學生運動，列隊請願抗日，被「行營」憲兵開槍傷了一些人，其中有八九歲的小學生。當蔣介石未統制陝甘時，張楊對羣運已相當注意，多方扶植和維護，但自蔣治陝甘後便壓受壓迫摧殘，西安一二九的慘案不過是其許多之一而已。羣衆一面憤懣地要求張楊主持正義，一面決於次日（十號）列隊赴城外蔣行轅再請願。張學良是一位好好先生，真是進退維谷，因為他已屢次向蔣陳述抗日大計，而得到的只是蔣先生的大發脾氣。他知道學生羣衆們到蔣那裏請願，是不但無結果，恐怕要大犧牲的。因此他勸學生代表們不要去，但勸也無用，學生羣衆堅持一定要見蔣委員長，當面得到答覆，張學良無法，連忙自己坐汽車先到蔣處，力陳羣衆的情緒之激昂，請其接受相當要求，決定救國大計，他說到眼淚都激動出來了，但蔣介石却大發雷霆，罵張學良不中用，他命令張學良把西安的抗日羣衆代表，都抓起來槍斃，張表示這一點萬萬做不到，蔣介石說他不做，他自己動手。於是命令立即開槍開砲，這簡直把張學良急得五內如焚。他又連忙坐汽車回去，在半途遇見學生市民的隊伍，這時他不顧一切，依然流淚地死死阻止

他們前去，他不敢把蔣介石對他的答覆完全公開，不敢說蔣介石正準備機關槍等待他們，所以學生們真是莫明其妙。但終於被張學良的誠摯的固執意思和那激動流涕的態度說服，他們說那麼一切張副司令負責作主，便列隊折回。隔天，張楊開始正式決定扣蔣。因為他們感覺到了蔣這人太鐵石心腸了，用兵諫的方式，也許可以使其動心。這決定非常祕密，連許多將領都不知道。十一號決定，十二號就行動。城內治安和其他任務由楊虎城負責，扣蔣由張部隊負責。據說扣蔣武裝隊伍衝過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警察公安局的，沒有開火，即放過去；第二道是行營憲兵，也馬上擊破了；第三道是蔣的衛隊，較為頑強，但也立刻衝破了。蔣介石在聽見槍聲響近時，已着了一件長袍走上了山裏，他在山上伏着，以為若是小部隊的叛變，避一下就可以平服的；若是張楊大隊的叛變，那就沒法，只好下來聽天由命了。聽說他因為心裏弄不清楚究竟，驚慌焦急，所以在山中跌倒了不能跑路。後來不遠處有兩個來搜查的兵士，一個說那裏也有一個人，開一槍罷，一個連忙止住說：不忙，也許那就是蔣委員長呢。蔣聽到了這話，心裏更明白了一切。於是揮手說：我就是蔣委員長，這樣便被擡下山，到行轅裏，他初不肯進西安，但看到遍地屍首，只得答應了，被汽車載往城裏。

共產黨代表在事件發生後，趕到西安，在那裏設立一個辦事處，有一排人守衛。蔣晤見周恩來，據說很出於蔣的意料之外，因為他到這時纔覺得共產黨的救國本意，他竟想不到共產黨原來是真心不直張揚的幼稚冒昧行動。所以我們可以說，西安事件確是一個必然的不幸；但以此為機緣，却開始

了國共合作的初步。

共產黨的這種政策，據說在兩廣事件時便已決定了，即主張統一對外，避免分裂。張楊的舉動，自然是未曾考慮到深遠處，未曾想到日寇與漢奸會利用這機會大肆活動，所以事變後他們馬上也知道利害而勇於改過。張學良每日總要勸蔣介石吃飯，洗澡，把自己仍然當作一個下級的人尊敬他。因此不久之後，他們得到了蔣的同情的答應，便一起飛京了。（聞多）

## 陝北的紅軍

### 統一戰線區

三原是到陝北必經之路，是十七路軍駐防的地方。由此往北，耀縣、同官、宜君、中部、洛川、甘泉等地，都由十七路軍和在陝北的軍隊擔任防務。因為常常在一個城裏同時有這兩支軍隊，所以這些地方通稱之曰「統一戰線區。」

三原是陝西最大的縣城之一，于右任先生在這裏，楊虎城也常到此地。市面相當的繁榮。我們在這裏拜訪了一個機關，那地方叫作聯絡站。

正好遇到三位剛從雲陽來的軍士，他們都很客氣，很熱心的招待我們，說離三原二十里的雲陽鎮，彭德懷便在那裏。

沒有離開三原以前，我再說些關於三原的見聞吧。那個連絡站位在一個很僻靜的角落裏，沒有掛着甚麼牌子；房子很簡單。連絡站是一種對外交通機關，從此往北的各縣城皆有，來往的汽車都從那裏經過。此地的負責人來自福建汀州，農民出身。他詳細的指示我沿途的情形與在陝北的軍隊的生活，不時有街上的十七路軍士兵進來聽他講話，他們已經變成很好的鄰居。

三原的食物極貴，而且作的很壞；饅頭是主要的食品，水總是混濁的。我休息的是旅舍，住着兵，住着各處往陝北去的人，同時也是妓女的下處。妓女成了革命者的鄰居，時時用眼色勾搭着，却是沒有人來理會她們。

坐了一輛洋車離開三原城，心裏被各種新印象纏繞着。沿路看的是破落的土城，穴的居宅，和生長得不好的麥田，約有兩點鐘功夫到了雲陽。

街上擠滿了人，叫喚的聲音鬧成一片，原來正開廟會。那邊不限制人民宗教的活動，這次廟會演了十多天的大戲，二三十里內的居民都趕來看熱鬧，他們就利用這機會作宣傳與教育的工作。

到了總政治部，由一個山西人出來招待，他說楊尙琨主任沒在家。秘書長也出去了，我便請他領我到各處去參觀。

這裏滿牆都塗着標語，「收復東北失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標語最多。參觀一個合作社，貨品很多，承辦一切用品。許多軍士在街上自由行走，隨便的攜着槍，有的在樹下與農民談話，有的

打籃球或網球，一個部隊正從街上經過，大家都跑出來看他們的衣服很不整齊，黑色、藍色、灰色、綠色，樣樣都有，年齡也不齊，有的非常小。他們一路唱着鋤頭歌過去。我問一個農民對於那邊的軍士的印象如何，他說軍隊剛一到來，都嚇跑了，後來聽說沒有殺人放火的事情發生，便都陸續回來了。對於這個軍隊發生非常的興趣，最奇怪的是找不到一個軍官，而竟能有那樣的紀律。

### 訪彭德懷

拜訪了姓陸的宣傳部長，約好明天見彭德懷。

記者同彭德懷談了一個下午和一個晚上。這位以善戰著名的人物看起來很像普通的農民，隨便在街上走着，同士兵詢問日常的生活，用手拍着他們的肩膀，顯出一種老叔父的樣子。我發現士兵們對他並不怎樣恭敬或畏懼，但是彼此間卻有一種家庭似的愛流露着。

他首先提出現在中國最大的與基本的矛盾不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而是日本與中國的矛盾。日本瘋狂的進攻威脅了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所以他們提出了一致抗日的要求。他們在西安事變中堅持和平主張。他說：「西安事變是兩種可能的前途，是中國生死的關頭：一種前途是開始發動抗日戰爭；另外一種前途是引起大規模的國內混戰，造成日本進攻中國的順利條件。我們是爭取第一個前途，敵人則是爭取第二個前途；因為他們無時不在挑撥中國內戰，藉以達到以華制華，滅亡中國的目的。」

彭加重了話氣繼續說道：「因為和平路線的成功，日本不但抹撥的政策失敗了，同時反增加了他們國內的矛盾。廣田內閣的倒臺，政黨與軍部的衝突，林內閣的擺搖不定，便是這種表現。日本的統治者也承認他們的政策失敗，不得不改變對華政策，這是我們的勝利。」

「還有，」彭停頓一下說道：「我們主張的是民族統一戰線，不是人民戰線，與西班牙不同。」談到這裏，暫停一下，我們一同去吃晚飯。

桌子上放了一盞煤油燈，大家團團的坐下。宣傳部長陸定一和楊尙琨的老婆李伯釗都來參加談話。李伯釗是個很有趣的女黨員，以後我還要提到她。

「中國適合那一種政治制度呢？」我問。

彭回答道：「爲了鞏固和平，爲了貫徹統一，爲了抗日勝利，必須實行民主政治；抗日沒有廣大的民衆來參加是不能成功的。如今中國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要抓緊民衆解放運動，民衆要起來作要求民主的運動，同時我們要在抗日運動中爭取民主，在爭取民主中求抗日，二者是關連的，不能機械的分開。」

講抗日問題，彭說道：「我們要在最短期間完成對日作戰的準備。東三省是有相當建設的，被日本拿去了，河北也有很好的建設，被日本統制了。我們是要開足馬力，不放鬆一分鐘，動員全國人民作政治的軍事的準備。」

於是我們約好次早談中日直接作戰時的戰術戰略問題。

今天是五一節，十二點有慶祝會，我得趕快結束同彭德懷的談話，這次我們談的是對日的戰略

問題。

彭說：「許多人對於戰勝日本的戰略問題非常關心，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會減少大家對於打勝日本的信心。抗日主要的問題是政治問題，戰略與政治是關聯的。我僅就戰略上，貢獻一點我自己意見。」彭於是首先提綱挈領的說道：「在戰略上我們應該採取持久戰，在戰術上我們贊成速決的殲滅戰。作戰方針要用一種運動戰。爲什麼呢？因爲中國不是侵略別人，而是保衛自己。自衛戰要靠持久來取得勝利。在軍事工業上，中國比日本落後，不能在戰爭的開端與敵人以致命的打擊，我們的勝利，有賴於廣大人民的參加抗戰。一切人民都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敵人，但這些人民必須在戰爭的過程中組織起來，動員起來，戰爭的初期中國或者會遭遇些不利，但情形會一天一天的好起來，中國軍隊受人民的擁護，與日本軍隊對一般人民的關係不同。有些人沒有看見中國人民的存在。作戰方針是一種運動戰，但並不是避免一切正規的陣地戰。我們的軍事佈置應該是據點式的，而不是線式的，因爲線式很容易被打破。以少數兵力箝制多數敵人，乃據點式的好處。在戰術上我們主張用速決的殲滅戰，因爲這樣可以減少敵人近代兵器的作用，使飛機坦克車毒氣的效能不能充分的發揮，而我們則用疾雷迅風的手段，使敵人一點沒有戒備，與以奇襲。我們的消息靈通，敵人的動作我們都知道。

他們卻沒有這種便利。我們熟悉地形，可以優勢的兵力擊敗敵人劣勢的兵力，這種殲滅戰可以得到敵人的兵器，補充我們的彈藥。打勝了幾次之後，敵人不敢再分散，就集中起來，我們這樣可以封鎖他們，圍困他們，這種圍困，是一種戰略上的圍困，使敵人消耗力量，使他們沒有辦法。同時我們在周圍組織羣衆，動員羣衆封鎖他們，擾亂他們，襲擊他們，斷絕他們的交通，使其疲於奔命。敵人到處被圍困，救援的軍隊也受襲擊，被消滅，使其前無進路，後無援兵，弄得進退維谷。假如敵人不動，定將疲憊不堪，日夜不安，隨着時間的延長，愈發增加困難。但是最大的問題還是動員羣衆，我們之所以要求民主，就是爲了抗日的勝利。祇有實現民主纔能使廣大的民衆參加抗日戰爭。」

## 五一節

講到這裏，外面喇叭與唱歌的聲音大作，已經是開會的時候了。我便同大衆一齊前往參觀。

快十二點了，各地來的武裝農民，學生部隊不斷的向一個大空場上流，一切種類的武器——長槍、大刀、鳥槍、新式的步槍乃至木棍都亮出來了，每人手裏都拿着紙作的小旗，上面寫着標語。有的農民是全家來的，他們坐着用牛或驢子拉的車，婦人和小孩都穿上他們最好的衣服，這是一個盛會！空場上搭好了司令臺，同時也是戲臺和講演臺。場的最後方站立着成列的軍士，前邊都是羣衆。保衛團和小學生拿來的青天白日旗在飄揚。今天是五一節，但是所有的口號標語卻沒有反對資本家或打倒地主階級的，有的儘是抗日與收復失地的。大會指揮是一個朝鮮人，他很耐心的把沒有秩



序的羣衆安排好了，於是，在又一陣軍樂後，便正式宣佈開會了。

先是彭德懷演講。他略介紹了五一節的歷史之後，很快的便把話頭轉到抗日上。每逢說到痛切之處，臺上便有人領導呼抗日的口號，臺下的軍士也都舉起了拳頭高呼着，此處我必須提出的，就是有許多農民羣衆並不熱烈的呼口號，有的竟在那裏不開口。我不曉得過去在執行土地政策時，是否也有這種情形。據後來他們對我解釋，說這種現象是因為他們到這裏不久，對羣衆的教育組織工作還沒有深入。一般農民因為沒有直接受過日本的壓迫，還沒有澈底明瞭國家存亡與他們個人生活的關係，所以還需要一個長期間的教育工作。大會另外的「改善工人生活」、「救濟災民」、「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稅」這些口號，在抗日統一戰線上是有實際意義的，因為祇有改善人民生活，纔能更廣泛的動員羣衆到抗日救亡鬥爭裏來。

天氣很壞，風吹着沙塵滿場飛揚，繼彭演講的是個軍隊代表。後來又有農民工人小學生和三原救國會代表的演講。講演完畢之後是唱救亡歌曲，由軍士分隊的唱，最後是演劇，記者因為要去參觀營房，未等散會便離開了。

#### 營房巡禮

軍隊都借住在民家裏，但是多半選擇那些不用的房子，以不妨礙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且這些還要經過人民的許可。據我同許多農民談話的結論，知道他們間的關係保持得很好。

我們參觀了三四處營房，物質的設備當然很簡單，但是佈置得卻很有秩序，每個人都有兩張氈子，牆壁上掛着自己用的碗、手巾、習字本，另外的地方放着槍架子。每個連隊都開出一間或二間屋子作俱樂部。那是軍士文化娛樂生活的中心，也是黨支部與教室的所在，通常都有乒乓球臺子，各種牌、棋、報紙和書籍，牆上懸着各種掛圖、表格、標語、佈告以及壁報，其組織分軍事政治、文化娛樂、經濟協助、衛生等委員會，而由主任一人負總責。另外有牆報委員會，係黨支部的機關。茲將各委員會的工作分述如下：

(一) 軍事政治委員會——指導軍士在課外學習軍事政治科目，組織軍事討論組與政治討論組，加強軍士的政治自覺，提高軍士的軍事知識。

(二) 文化娛樂委員會——組織唱歌隊、識字班、劇團、讀報組，領導軍士討論時局問題，提倡體育、娛樂及各種競賽。

(三) 經濟協助委員會——注意經濟檢查，改善給養，號召與發動節省經費，幫助指導員檢查與保管武器及進行籌款等事。

(四) 衛生委員會——領導全團衛生工作，注意個人衛生與公共衛生，發動檢查衛生工作。這種組織不但在連隊裏有，在所有大小機關乃至學校工場裏也都普遍的設立，而且各處都有自己的壁報，成爲他們教育羣衆一個很重要的工具。壁報的內容包括很廣，有的分成許多欄，如新聞、

論說、黨團的生活、軍事政治的學習與勤務、生活批評、漫畫、故事、謎語、標語等。稿子都是由作者自己抄寫的，貼在一大塊紙上，中間再加上花邊或裝飾上彩紙。它是黨支部影響羣衆的機關，同時也是大家的園地。

所有的俱樂部都充滿着人，在那裏熱心的念書；看報；打兵兵；或是將棋。他們臉上都顯着一種愉快的樣子，好像些中學校的學生。

他們的士兵叫「戰鬥員」或「戰士」，長官叫「指揮員」。一切在外表上，看不出誰是戰鬥員，誰是指揮員。至於生活的待遇，也是一樣。

### 、長征中的女戰士

一九三四年十月開始了萬里的跋涉，當時整整有三十名婦女參加，她們雖然一路經過若干艱難危險，穿過七八個省份，走了二萬五千里，越過無數高山大河，但是竟沒有一個人死亡，原來身體不好的，反轉好起來，現在都平安的到了陝北。

李伯劍說：她們要作一本小說，起名就叫「三十個」，來紀念這一隊共患難的戰友。這三十個女人，她們那種堅苦奮鬥的生活，確實與今日沉淪在都市享樂生活中的婦女迥異。李伯劍把她們的姓名一一告訴我，在這裏我把它列出來：劉英（洛甫妻），陳慧清（鄧發妻），劉羣仙（博古妻），危拱之（葉劍英妻），危秀英，李伯劍（楊尙琨妻），蔡暢，李建貞，金維映，賀志健（毛澤東妻），廖施光，錢

希均，韓世英，鄧穎超（周恩來妻），周月華，廖月華，阿香，吳胡蓮，王乾元，吳仲蓮，鄧六英，謝小眉，鍾玉林，劉彩香，鄭玉，楊厚增，李小江，李建華，康克清（朱德妻），丘一涵。

這些女人來自不同的省份，出身也不同，農工成份佔多數，可是都結婚了。老婆爲「蘇區要人」在私生活方面惟一的「奢侈」但也並非限制一般人的結婚，而且「要人」也不完全討老婆。彭德懷已經打了半生的光棍，最近哄傳他和丁玲女士戀愛，但他絕對否認。

住在雲陽鏡的婦女幹部祇有李伯釗，今天五一節，陳慧清從附近的鄉村趕來。

這兩個不同型的女黨員，一個出身產業工人，一個出身知識階級。

李伯釗說，她是四川重慶人，父親作過縣知事，是老同盟會員。她小時在四川讀書，中學時就受了革命的影響，尤其是五卅運動的刺激。張聞天（洛甫）揮代英是當時她的教師，從他們那裏她接受了新學說。一九二五到上海作青年工人的工作，北伐到了武漢，準備上海暴動未成而她便被捕了。出獄後，她被派去莫斯科，入中山大學讀書，一直住了六年，並在那裏同楊尙琨結婚。一九三〇年回國，一直到哈爾濱又被捕起來，釋放後回到上海入煙草工廠活動。繼在瑞金紅色中華報作編輯，與危拱之合辦高爾基戲劇學校。一直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參加長征，入西康會三過草地，有一次險些淹死。她現在仍從事戲劇工作，她寫過很多劇本。

陳慧清今年二十八歲了；生在香港，家裏很貧苦；父親是個金屬機器工人；還有個妹妹。她十四歲

便入工廠作工，十七歲時（一九二五）參加香港大罷工，一九二七廣州暴動失敗後，又回到香港，入南華襪廠。一九三〇和鄧發結婚，鄧爲政治保衛局局長，她在那裏工作。一九三四年參加長征北上，現在她便到雲陽鎮附近作婦女工作，同鄧發分手已經一年了。

### 在耀縣

我們離開雲陽鎮。我們的車開到耀縣，已經是十二點了。我們預備去見賀龍，他住在驢城三十里的莊裏鎮，但是聽說他正在同人談話，我們不進去打擾。

爲了運米，現在從三原敷設一條小鐵軌到耀縣。耀縣每天有載重車再把這些米轉運到陝北各地，因爲陝北今年又遇旱荒，一半的喫食要靠外面供給。

耀縣有在陝北的軍隊一連人，城防由十七路擔任，他們很和睦的住在一起，下操、唱歌、演習，彼此間比賽着。這個古城頓然變得很有生氣。宋范文正公曾在此地做官，藥王也生長此處。街上很多人家掛着舉人進士翰林乃至貞節的牌匾。這原來是個很有歷史的城鎮。

傍晚有一大堆軍士圍住我們談話，一幕一幕的講述過去的經歷，熱心的解釋他們的新策略。一般知識都很高，能解答許多問題。

三輛載重車一齊出發，我們這輛除我外還坐八個人，他們都是從太原來的，已經在那邊的軍政訓練班受了三個月的訓練，現在預備到延安抗日大學深造。有兩位女學生，很好唱歌。青年男女在一

起，多少增加了旅途的興趣。

從耀縣往北，都是山路，車子總是用最慢的速度爬上去，爬下來，一不小心就墜到山澗裏，我們一個也不會活命。翻過一個大山，以爲前面是平地了，但是接着又是一座大山，這樣艱難的經過同官、宜春、中部，達到洛川的時候，已經天黑。洛川是一個建在高原上的孤城，夜裏很寒冷。我們沿路上看見許多堡壘，有的建在山頂上，有的在汽車路兩旁。有人說陝北的山岳構成一種天然的國防地帶，防空的問題很容易解決，在未來抗日戰爭上是有很大的意義。

在洛川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起來出發，十二點到了甘泉喫中飯。滿城一片瓦礫，祇有幾家小店，真不像是個縣城。此處縣長太太也在抗大讀書，一同搭我們那輛車返延安。

經過勞山，人們指點我何立中自殺和周恩來遇險的地方。此條山路十分險要，土匪時常出沒，軍士正在燒山，使土匪沒有隱藏的地方。

縣長太太指着遠處的塔尖，說前面就是延安，果然，十分鐘後，我們便達到目的地了。

我們都被外交部招待下，成了延安市的貴賓，所住的外交大樓，是一個容有五間房子的小院落，但這算是延安最漂亮的房子了。延安除了三原之外，算陝北最繁昌的城市。走到街上，隨處都是穿制服的人，我們穿便衣的人，很像怪物似的被人們注視着。街市的兩旁擺滿了各種雜貨攤，軍士算是他們最大的主顧。在陝北的軍隊最近也發餉了，雖然數目較小，可是因爲過去從來沒有用過錢，一旦有

錢，就隨便的花起來。照像對他們是最有興趣和最新奇的事，投機的商人看準這點，就在一個月內開上兩三家照像館，攝的很壞，但取費卻非常貴。然而這有什麼關係呢！那邊的軍士是很不計較的。

至於走私來的玩具和每天來的汽車當然也是新奇的，百看不厭的。還有一個現象，就是人人都有一支自來水筆，插在口袋裏。我問一個軍士是花多少錢買的，「三塊錢，原來討價五元呢！」一看，卻是假牌的。延安又名膚施，有許多宋代以後的廟宇古蹟。聽說當年因為控扼西北的孔道，曾一度繁盛。城牆一面建築在山上，一面臨河。這條河名叫延水，終年流水不斷，為延安城添加風景不少，而居民飲料，也賴以解決。

這裏人口有五千多人，五分之四是軍士和陝北各機關的職員，然雖「蘇維埃中央政府」、「共產黨中央局」、「革命軍委會」等等機關都設在此處，但是實際上還是統一戰線區。縣政府照舊辦公，高懸青天白日的旗幟，有保衛團，書店裏有三民主義和蔣委員長的著作。

陝北方面為了討論在西安事變後形勢下的各項問題，從四月三號起在延安舉行一個大會，多數的黨政軍領袖都集中在這裏。卻因為他們都在等着開會，所以記者未能一一晤及。

### 抗日軍政大學

抗日大學簡稱抗大，校舍分散在延安城內和城外。我到延安後第二天，便去參觀城內那一部分。全校學生有一千二百多人，分成十二隊，第一隊至第八隊完全是軍隊幹部。九隊到十二隊收容

從國內各地來的青年。

這次參觀的是第一隊和第二隊。校址就在延安師範裏，大門上橫掛着一塊紅地白字的長旗，寫着「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的字樣。校長林彪不在校裏，由一位學員領我們參觀一週。

教室很整潔，牆上掛着各種圖畫，壁報和紅布製的標語。我驚奇他們有這樣美麗的教室，他們一定像小學生似的熱心佈置着呵！各班有不少富於藝術天才的人，作的漫畫和人像是很不壞的，嚴肅活潑緊張團結這幾個字的校訓，實際上在各方面表現着。

這兩隊學生都是高級幹部，聽說多半在師長以上；第一師師長陳賡也在這裏學習，但同時又是第一隊隊長，負責該隊的生活與教育。

宿舍也很清潔。在女宿舍裏遇到朱德的老婆康克清和另外兩位女生，後來才知道其中一個叫廖師光，是凱豐的夫人，一個叫蹇先佛，是蕭克的夫人，他們都是第二隊的學生。

按着文化水準，各隊的功課稍有些差異，主要的科目有政治經濟學，辯證法，列寧主義，中國革命問題，中國革命史，民衆運動和統一戰線的理論；在軍事中，特別注重戰術和游擊戰爭。毛澤東、朱德、凱豐、博古、吳亮平、蔡樹藩等人都是那裏的教授，其中毛澤東的辯證法，是最受學生歡迎的。

九、十、十一、十二等四隊的校址，是在城外飛機場旁邊，學員共四百二十名，其中包括女生四十多人。因為有陸續來要求入學的，所以計劃續招第十三隊。這些學生都是在各處參加過救亡運動的大



學生、中學生，和一些工農。以省籍論，陝西、東北、河北、山西、山東、四川、湖南、江蘇諸省最多，也有遠來自朝鮮、安南、南洋的。他們爲什麼不避艱險的跑到這裏來呢？爲着滿足好奇心或是爲求「時髦」嗎？這是不會的，因爲此處堅苦的生活不能容納這種人，粗糙的飯食，嚴格的紀律和繁重的學習，會使那些爲追求放縱生活而來的人，馬上感到失望。

「抗日」是這個學校的名稱，也是它的功課的內容，我在處處看到的是抗日標語，我從人人聽到的的是抗日言論，我也祇有從這方面去理解來到這裏的學生了。

抗大直屬革命軍委會，經費每月兩萬元，比在江西時節省許多。聽說甘肅慶陽還有個步兵學校，是爲造就下級幹部的，學生有二千多人。

外來的學生，經過介紹後，還有一種簡單的入學考試，看他的政治水準如何，以便分隊；另外要填一張很詳細的表格，問他過去的歷史，社會及家庭關係等等。

計劃每期爲四個月或半年，看情形來決定。每天有三小時至五小時功課。早晨五點半起牀，下早操三十分鐘。早飯後繼續上三堂功課，然後午飯。下午隔日兩堂，男生有軍訓，女生則習看護。晚飯後自習，九時半就寢。

實際上是一點沒有空閒的，因爲除了上課外，還有各種小組會、討論會、座談會、娛樂會和特別演講，以俱樂部爲中心，由學生自己來管理體育、文化、衛生、經濟各方面的生活。紀律也靠生活檢討會來

實行自我批判。譬如，剛從外邊去的男女學生，如果有浪漫的行爲，便要遭受嚴厲的批判。

此外，每週總要有一次晚會，集合大家在一起，演劇、唱歌、講故事，盡情的快樂一晚。這次延安爲紀念五一節，一連開了三天運動會。那邊的軍士雖然善於穿山越嶺，有二萬五千里「馬拉松」的紀錄，但在運動場上卻丟了臉，一切頭獎都被外來的學生奪去，而這些學生在外邊時候不過是未入流的「選手」。

毛澤東的辯證法和博古的中國革命史是頂叫坐的功課。毛教授在上課時，總好講笑話，尤其好引用男女間的事來當譬喻。除掉上次說過的教授外，還有成仿吾、張國燾、張汝新、童必武、吳習光、劉鼎、張慶孚等數人，他們的月薪一律是兩元，同學生每月的津貼相等。

我在這裏遇到三個隊長，他們同時都是第一隊的學生，在軍隊裏居重要的地位：第十隊長聶鶴亭是一九二七年黃埔武漢分校的畢業生，爲彭德懷的參謀長；第十一隊長邊章五是一九二三年保定軍官的畢業生，現任延安警備司令；第十二隊長何長工是一位極其有趣的人，樣子很像一個老實的農夫，卻是從德國回來的留學生，同李立三是老同學。他說現在軍隊裏有不少留德的學生，他作過第八軍軍長。

我問邊章五道：「你們不是主張立即抗戰嗎？怎麼現在又唱準備論調呢？」邊想了一下，回答說：「現在的情勢是不同了，現在是在統一戰線下，進行全國對日抗戰，所以我們的步調要同全國一致。」

但是無論那天日本再來侵犯，我們都要立時抵抗，至於同日本的最後戰爭，我們爲了達到收復失地和完全勝利的目的，必須加緊準備。」

我又問關於劉志丹的消息，他們說是在山西洪洞縣陣亡了，爲了紀念他，把保安縣改爲志丹縣，現在劉還有一個兒子在延安念書。

劉志丹是陝北保安人，初爲馬鴻逵部下，民國二十年在陝北暴動，當時不過數十人，後來漸漸擴大，成立二十六軍，和從陝南的二十五軍徐海東部會合，約有一萬人，在瓦窯堡設立政府。二十五年後毛澤東、蕭克、賀龍相繼趕到，徐向前與朱德又於去年九月在甘肅與其他部隊會合，遂造成大團圓。

看見徐海東，他是由前方趕來開會的。這個以鑿工出身的軍事人物，談起話來非常真摯。他的家鄉在湖北黃陂北鄉徐家橋，離河南邊境很近；他小時就在這些地方混熟了，對他以後在鄂豫皖邊區的活動，很有關係。

我問他關於對日作戰的戰略問題，並把彭德懷所說的告訴他，他說他的意見與彭德懷相同。中國要採取持久的運動戰。

#### 訪問了張聞天

延安有兩位出名的近視眼，一個是張聞天，筆名叫洛甫，一個是秦邦憲，筆名叫博古。一般人祇知道他們的筆名，原來的姓名反而不用了。我同他們倆人談過很多話，現在把他記下來。

洛甫是中國共產黨書記，但他的名字在中國卻不如毛澤東那樣爲一般人所知。

我們的談話開始。

他說：「我們現在政治的大綱，是根據三民主義與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精神，分爲民族、民權、民生三項。在民族主義上，我們要求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確立抗日國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各弱小民族，參加和平戰線並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對於國內的少數民族，與以完全自決權。在民權主義上，要與人民以集會結社出版言論之自由，由國民大會產生民主的憲法，從而樹立民主政策，行議會制度，並規定中央地方內之權限。在民生主義上，可分兩方面來說。一是國防經濟建設，所有建設皆以國防爲中心，發展民族工業，使重工業國營，加緊軍事、政治、文化、交通的準備。一是改善人民生活，造林墾荒以救難民，取消苛捐雜稅，限制高利貸，規定佃租關係，土地問題以適當手段求其解決，施行八小時工作制，保護童工女工，普遍工人教育，實行社會保險法。

我又問，他們致三中全会通電裏的四項保證，現在都實行了嗎？

「軍隊改編和蘇維埃改爲特區等具體工作，不久皆將實行，至於沒收地主的政策很早已經停止了，現在此地看見一點違背和平統一的口號與行動嗎？這可以表示我們的誠意。」

「軍隊改編的數目和中央發給餉糧的數量，都已經規定了嗎？」我選更具體的題目問他。

「軍隊仍照現有的數目編制，現在餉糧的數量雖然很小，但是我們要很好的分配開，我們這裏

沒有待遇上的差異，一個軍長同一個普通戰鬥員完全過一樣的生活。」

他又說：「爲着中華民族的澈底解放，每個人都要工作，一刻不鬆懈的工作。前途的阻礙與困難是難免的，祇靠大家的努力才能克服。一些青年人犯性急病，感覺前途荆棘太多，勝利遙遙無期，因而感到失望，甚或盲動起來，這是不對的，因爲勝利只能是持久的艱苦工作的結果。抗戰不是靠少數人冒險衝鋒能夠得到勝利的。」

### 黨代表大會

洛甫因爲有事，約好以後再談，我請求允許我以記者的資格，到黨代表大會去旁聽，但被拒絕了。結果我只好在他們散會的時候，到會場巡禮一週。

會場借用一個天主教堂，不久以前的西北青年救國代表大會就是在這裏開的。會場裏邊滿掛着五色的錦幛，是各處送來慶祝大會的。形式顏色字體都非常新穎，有的製成美麗的圖案，就是慶祝婚禮的喜幛，也沒有像這樣漂亮的。這些賀幛是由各地救國會、黨部、軍隊、商會、劇社、政府機關，以及蒙民回民送來的，賀詞有很多種，如「爭取民主權利」、「鞏固國內和平」、「團結禦侮」等等。

這次大會由五月三日起，一直開到五月十五日，各軍隊和地方來的代表約有一百多人。大會主席團爲毛澤東、朱德、洛甫、張國燾、林彪、博古、林伯渠等。

禮拜日休會，一羣青年男女利用會場來排戲，時時哄堂大笑，原來排的是「阿Q正傳」。爲了招

待大會代表，延安差不多隔一天演一次戲，這個叫作晚會。

出了會場，一個擁護西班牙革命的示威正從街上經過，參加的人很多，包括市民，小學生和軍士。他們一路唱着歌，高呼打倒法西斯佛朗哥的口號。大會堂的門前，不知何時也懸上一個西班牙文的標語。

我從人羣裏穿過，看見美國記者施愛義女士，正從一個高處照像。她年紀在五十歲左右，身體還很強健，西安事變後才從三原來到這裏，現在正爲朱德作一篇很長的傳記。她住在一個山洞裏邊，吃的是中國飯，爲了採訪新聞，竟能拋棄西洋人的現代生活，來過這樣原始的生活。我對這個異邦女人，不勝驚奇。（麗亞）

## 陝北的法庭

在延安城外，踱過一條寬暢的溪流，於是一片低矮的彫敝的土屋，佔據了很大的面積，在渭涼山的腳下很齊整地一排排地出現了。在過去這地方曾經做過兵營，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校舍，四週的圍牆，已經坍塌了，在每處坍塌的地方，都還殘留着風雨吹襲的餘跡。大門兩邊，有一對拙劣石工彫鑿的石獅，石獅外邊，還豎立着兩支老朽的旗桿，看來這裏從前曾經是一所廟宇，牠是甚麼廟已經不可知了。——也有人說是聖廟——門上邊有一方直額，刻着「兵工建設」四個字。而門旁却貼了一

張十分惹人注目的紙條，那上邊寫着：

「陝北公學報名處」

我從牆垣坍塌的地方走進校內空場上，晚秋的陽光正輝煌地照射着校內所有的一切。我因為特來訪問成仿吾先生，便一直從兩排房子的中間走進去；而這時全校的學生們却正每人持着一條木橈到禮堂集合。

禮堂站立在全校中心的地方，只有這所房子比較高大，寬暢，在鋪蓋着深灰色瓦片走廊的下面，支持着幾支柱樑。看來這便是過去那所廟宇的正殿。殿內牆壁上，還刻着當年供獻祭地的碑石。而現在代替了這許多碑石的最爲惹人注目的東西，却是那些用有光紙白報紙或者信箋上寫着的學生們的作品，配合着紅色的線條和紅紙剪成的字體和星花。

這時集合到禮堂來的學生更多了。每人的臉上都呈顯着一種緊張的興奮的情緒。

「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有人說道。

「當然的……」另外的人們接着說。「這是紅軍十年來的第一樁桃色公案……」

「不許說話了。」說着，前邊走來了一個人，大聲招呼着，「現在就宣佈開會了。」

我從人叢中間穿過，走向校長室的那邊去。忽然一個人從後邊握住了我的一隻手掌說：「你找校長來的嗎？」說話的人是和我同道從雲陽跑路來的一個學生。他不等我說話就又說道：「校長恐

怕就要參加開會了。」

我正想要知道這是開的甚麼會，當時他就告訴我是一個「抗大」的學生，因為戀愛，用手槍殺死了一個陝北公學的女生。有人主張這兇手應該槍斃，也有人提議不必槍斃，所以現在開會徵取大家的意見。

晚間，在招待所的昏暗的燈光下，同伴杜將這事告訴我了。

「兇犯是一個紅軍幹部黃克功，」他說。「也是一個老資格的共產黨員。現在是抗大的學生，他會有過十年鬥爭的歷史。他愛上了一個女人，名字叫劉茜的，——一個陝北公學的學生。後來這女人又不愛他了，於是他便用手槍將女的打死。……事後他又希圖消滅證據，於是別人便將他檢舉了。」

說完，杜又輕輕地歎息了一聲。

「就是這樣，你看，」杜舉起了他那頭蓬蓬的長髮，燈光在他鑲銀邊的鏡片上面閃動着，問我說：「應該槍斃不？」

第二天，我和杜在慶祝北上會師的民衆大會上，又逢到昨天和我談話的那個學生了。他告訴我，說黃克功槍殺劉茜的這一幕悲劇明天將在陝北公學公開審判，叫我早一些過河去旁聽。

我旁聽公審去的時間還很早，禮堂裏又擠滿了人了。這時，校長成仿吾正在報告：

「關於黃克功槍殺劉茜的這一件案子，我們前天曾經開會討論過，……但是結果呢？……」



他以一種探詢的目光來察看了一遍每人面上的神情。看來他已經是將近五十歲的人了，穿一套破舊的軍服，戴一頂青色的紅星帽，顏色已經褪落，看去也是兩年以前的作品了。但是具有一種青春的，飽滿的，在延安這地方從其他同志的面孔上也時常可以見到那種堅定的絲毫不可動搖的精神。他用一種簡短的言辭和清爽的聲音接着說道：

「結果並不圓滿。這原因是由於許多同學未能認識這件事情的本身。有人將牠估價過大，說牠有政治的漢奸的背景。也有人看得過於隨便，主張將兇犯送到前線去戴罪圖功，就可完事。其實呢，這全是錯誤的觀念。因為這事的本身只是一個戀愛問題，我們便把牠看成戀愛來討論好了……」

「因為前天未能有結果，所以今天我們採取表決的形式，以徵取多數人的意見。然後我們便將這意見供獻給今天午後的公審法庭。至於其餘少數人的意見呢，我們也不放棄——不怕僅只是一個人的意見——在公審法庭上，仍然保留他發言的權利。只有這樣，才能發揚民主的精神。」

校長報告完畢之後，激烈的論爭遂即開始了。論爭的據點仍然只是兩個，一是主張槍斃，一是主張保留凶手的生命，戴罪圖功。因為他有過十年鬥爭的歷史。

午後一點。

在公審法庭——陝北公學的空場上，擠滿了學生，機關職員和其他旁聽的人們。

西風吹拂着地上的沙粒，在校外和空場的四週，站立着幾名臂上纏着紅布的巡查。

公審程序宣讀到凶犯黃克功到庭的時候，全場的空氣俄然緊張了起來。幾千人的目光全集中在從兇犯候審室走向法庭的那條路上去。羣衆全都屏息了聲音，等待着犯人到庭。

幾分鐘後，六名守兵帶着犯人從那條道上走來了。兇犯是一個很年青的傢伙，矮個，仄臉，有一雙深擊的眼睛。穿一套青色舊軍服，頭髮披散着，跟隨守兵到審判長的面前被告地位坐下來。

首先，由檢查官宣佈了兇犯犯罪的事實，向審判長提起公訴。要求將兇犯執行槍斃。審判長是雷經天。首先向犯人問道：「黃克功是你嗎？」

這時所有的幾千人的目光，全落到了黃克功的身上來，等待着他的回答。他並不畏懼，聲音也不顫抖，他用了一種頗爲爽直的聲音說：「是我。」「多大年紀？」「二十六歲。」

幾千人的心，全隨着他的聲音起了一陣輕微的震動。像似都在驚異和惋惜的說：他是這樣年青啊！

「你作過甚麼事？」

「我從十六歲加入了紅軍，已經十年了。曾經當過團長，抗大隊長……」

「那麼……」審判長繼續問道：「蘇維埃的法律你懂麼……你懂爲甚麼你將劉茜槍殺？你知道她也是共產黨員嗎？你殺死了自己的同志……你有什麼好說！」

「審判長，」黃克功的臉色蒼白着，向審判長那邊轉了一個身，臉上起了一層痛楚的痙攣，然而

他却故意放大了聲音，去抑制他那胆怯的抖動，說：「我一時糊塗，將事作錯了。但是，她……她不應當騙我。她口頭答應了和我訂婚，她又不承認……我一時心急，便將她打死了……打死在清涼山下河邊石旁的黃昏裏……」

審判長却用了一種十分嚴厲的口氣說：「現在檢查官提起公訴，要求將你執行槍斃，你服不服？」

「當然的，」他的臉色更蒼白了。「我承認我的罪過，槍斃我也甘心。但是自從我十六歲加入了紅軍，現在已有十年光榮的鬥爭歷史了。我曾經帶領了一團人，打勝了×××的一旅人，也曾帶領一營人，打勝×××的兩營人。現在爭取民族解放的抗日戰爭已經爆發了，若果審判長能允許我的請求，我希望將我的血流到抗日的前線戰場上面去……」

旁聽的人們，許多人被他這動聽的言詞打動了。也有人流下淚來的。但是在參加各機關公審代表人的談話中，竟沒有一個主張可以容許他的要求的。前在陝北公學開會時主張留他將功折罪的那個人，這時也沉默了。

審判長退庭，考慮宣判。

五分鐘後，判決書拿來了。依法執行槍斃。

「共產黨萬歲！」黃克功要想喊一聲口號，但還不會說完，就被守兵拖走了。幾分鐘後，很清晰的

兩下槍聲，從外面傳送了過來。

這時，洛甫同志正在代表黨中央發表談話：

「……在過去，他是我們紅軍的幹部，他是忠實的共產黨員，但是現在他已經不是了，……他犯了蘇維埃的戀愛自由的法則，他破壞了紅軍的铁的紀律。他用槍殺死的是自己的同志。若果他殺死的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是漢奸賣國賊，是托洛茨基派，我們能槍斃他嗎？不，絕對不能，我們要擁護他的……現在他犯罪的結果，是間接着幫助了敵人；雖然他有過十年光榮的歷史，但是他犯了不可宥恕的過錯。所以我們要槍斃他。……現在被槍斃的黃克功，已不是從前的黃克功了。……」

一天最後的一線陽光從山峯消逝了下去，城廓已充滿着黃昏的烟霧了，

進城時候，我經過了河旁沙灘上劉茜被殺的石旁。

## 陝北的文藝

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會有過兩個世界，一個是荒淫糜爛，一天天朝墮落滅亡的路上走去，另一個新的世界却在砲火的圍牆裏，慢慢的生長，慢慢的強壯了。新的制度，新的經濟建設，新的軍隊，一天的穩固，一天的堅硬，而新的人格，偉大的個性的典型也產生出來了。這就是眩耀了同時代的地球上所有人類的蘇維埃紅軍的建立。這十年新的世界的出現，雖說震撼了世人的耳目，却不斷受着

污蔑、造謠和極端的壓迫，所以一直到現在還保持着神祕在一切人心中。固然慢慢的會更被了解，被贊助，因為在共產黨正確的領導之下，他的真面目，頑強的爲着爭取民族解放拚死精神，是一天一天顯露了出來，而走到廣大的社會羣中去了。

爲了緊張忙迫的環境和需要，在蘇維埃運動中，文藝的確是比較地落後的部門角落。雖說無處不在，創作着偉大的文學題材，然而優秀的傑作，確不多見。這一事實常常促外來的新客感到驚訝。字林西報便發出過美中不足的驚嘆，然而說蘇區是沒有文藝，都是非常錯誤的！看來似乎是荒蕪的冷淡的陝北的山川，然四野却也雜亂的怒放着許多奇葩。作者個人只來這裏很短時間，又以未得窺瑞金興國爲憾，却願根據此一二，說明這沒有發現的一角。想來還有很多疏忽和不明之處，好在這企圖做一第一次最先的傳聲，諒該邀到在蘇區從事文藝的朋友的諒解的吧。

蘇區的文藝，到現在還沒有產生過如同阿Q那樣藝術成熟的作品，就是像子夜八月的鄉村……有着豐富新鮮，大的場面的描寫也找不出。然而却自有他的特點，如同蘇區的戲劇運動一樣，就是大衆化，普遍化，深入羣衆，雖不高妙，却爲大衆所喜。這個表現在紅軍部隊裏各種報紙以及牆報上的，如紅星、戰士、火線、抗戰……這裏都擠滿着很多的有趣味的短篇和詩歌，使用了文學上描寫的手法，畫出了紅軍部隊活生生的生活，這些小報有的是油印，有的是鉛印，但不管是紅軍首長的檯子上，電話機旁，或是戰鬥員的口袋中，都看得到他們是正被愛着，而沒有人捨得不去讀他。這些文章都是從

那些從事於連隊政治工作和一些上火線的各級指戰員寫來的，很少沒有錯字，很少寫得清清楚楚，但因為是真實的表現了自己，所以他們愛着這些紙張，如同那些寫得更幼稚的連上的牆報一樣。在連上大部分的戰鬥員甚至雜務員，雖不善拿筆，却不缺乏口齒，他們不倦的講着，請了會寫的人來幫忙。而第二天便有全連的人熱心的站在那裏讀着他的作品了。不僅紅軍部隊如此，在所有機關，所有羣衆團體，如婦女會、工會、農會、工廠、學校等的小報及列甯室的牆報上，也一樣排列着各種不同生活的寫照。所以雖是在印刷業不發達的蘇區，而文藝的花朵，縱是一些很小的野花也好，却是遍地的浮映着，如同海上的白鷗顯得親切而可愛。

創設了蘇維埃的人們，和那些從土地革命生長了出來的人們，具着新生的明朗的氣氛，在各種工作方面顯示了獨特的明快的作風。在文藝上也呈現出活潑、輕快、雄壯的優點，最能作證明的，便是流行着比全中國都豐富的歌調，不只採用了江西、福建、四川、陝西……八九省的民間歌謠的形式，放進了適合的新的內容。如送郎當紅軍渡黃河歌，這都是一些不朽的佳作。而且創作了新的雄偉的第二次全蘇大會（堪比馬賽曲、國際歌）及武裝上前線……這些歌曲，跟着紅軍的隊伍，四方的散播着，永遠留在民間。

新的奇蹟似的事態，跟我又發生了，這便是記長征的二萬五千里，開始的時候，徵稿發出後，還不能有一點把握，在那憂心悄悄之中，却從東西南北，幾百里，一千里路外，甚至從遠到沙漠的三邊，一些

用臘光洋紙寫的，用粗紙寫的，紅紅綠綠的稿子，坐在驢子背上遊覽塞北風光，飽嘗灰土，翻過無數大溝，皺了的，模糊了的字，都伸開四肢，躺到了編輯者的桌上，在這上面，一個兩個嬉開着嘴的臉湊攏了，顫動的指頭一頁一頁的翻閱着，稿子集到一尺高，兩尺高，幾百個手在一些沒有桌子的地方，在小的油燈下寫滿了來的。於是編輯的入，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着。膽清着這些出乎意外，寫的美好的文章。從出發前編起，一直到達陝西，鐵的洪流衝破了幾十萬血肉滲雜着猛烈砲火，鋼鐵做成的長城，同無法克服的殘酷的自然做了鬥爭，而且在不斷的轉戰中還要同自己內部分歧的錯誤的意見做鬥爭，一段一段的多麼驚心動魄的場面。在一百幾十餘人中，產生了優秀的，洋溢着天才的作家有艾平、彭雪楓、莫休、一氓、定一……諸人夜渡烏江，大渡河搶渡，婁山關前後，再佔遵義，有聲有色的被描繪了出來三十萬字的巨著，經過徐夢秋同志努力編輯，已經完工了，想來不久就可同數千萬焦急的等待着讀者見面。

於是文藝的興趣被提高了，文藝的書籍也在有人搶着閱讀，而且有了文藝協會的組織，在延安的會員就有幾百，油印的小刊物（純文藝的）總是供不應求，每日都可以接到索閱的函件。作為選稿者的前方指戰員，或者小村落上的劇團的演員，擁擠的稿件，塞破了編輯者的皮包，琳瑯滿目，想不到的一些材料都被使用着了。而大的整個的材料又正在有計劃之中被搜羅整理中。這難道還不是令人滿意的情況嗎？

這初初的蔓生的野花，自然還非常幼稚，不能壓足高等博士之流的幻想。然而卻實實在在是生長在大衆中，並且有着輝煌的前途是無疑的，一切景仰着蘇區的讀者們，等着吧！而從事於文藝的紅軍青年，努力吧！（丁玲）

## 陝北的劇社

當我同一個邀請我到「紅色劇社」去的青年軍官一同出發的時候，人們已經向着由一所舊廟臨時搭成的露天戲台移動了。那天是星期六，日落前的兩三點鐘，整個保安好像在走向那裏去。

紅校的学生們，驢夫們，軍衣工廠和鞋工廠的女士們，合作社和紅色郵務局的書記們，士兵們，木匠們，鄉人和他們的小孩們——都開始向着河邊的大草原上流去，在那裏演戲劇者正在表演。這是一個意想不到的民主化的聚會。甚至於一些羊都在離不遠的網球場上吃草。

那裏不賣票，也沒有什麼優先座位。我看見中央委員會書記洛甫，財政委員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澤東，和一些別的官吏們以及他們的妻子們，在羣衆中散佈着，和別人一樣地坐在有彈性的草捆上。演劇開始以後，大家對他們都很少注意。

橫掛在台前的是一塊大粉紅綢幕，上面寫着「中國人民抗日紅色戲劇社」，是漢字，同時也有拉丁化的新文字，這種新文字紅黨們正採用着來加速民衆教育。演劇程序定三小時演完。裏面有戲



曲、跳舞、歌唱和一種中國劇。這劇是一種雜色的表演，或者是童謠，主要的是表現兩個中心題目——反日和革命。它充滿了明顯的宣傳，完全率直的，而它的情調是原始的。但它有着從銅鑼敲打和假聲歌唱解放出來的優點，而且是和活的材料有關係，不是一些沒有意思的歷史設計，如同沒落的中國歌劇一樣。

最後，它在機巧和精緻中所缺乏的東西，由它的強壯的生活力和它的感人的幽默，以及一種演者和觀者之間的交流，一部分地被補充起來了。在紅色劇社的客人，好像真地細「聽」台上所說的話。這和中國其他酣歌醉舞的觀眾對比起來，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因為在中國聽戲的人們，主要的時間是消耗在吃菓子和瓜子，談話，來回地拋熱手巾，從這一個包廂去拜訪另外一個包廂的人，而只偶爾地看到台上去。

這裏的第一齣戲叫做「侵略」。開幕的時候，是一九三一年在湖州的一個鄉村的場面。日本人來到了，把不抵抗的中國軍隊驅逐去了。第三幕是日本軍官們在一個農家裏宴會，用中國人當椅子，喝醉了酒去調戲他們的妻女。再有一幕是表演日本販賣嗎啡和白面的毒犯，強迫每一個農民買一定的分量。有一個拒絕買的青年被帶走去受詢問去了。

「你不肯買嗎啡，你不遵守滿洲國的衛生法律，你不愛戴你的聖主薄儀，」他魔王一般地責備他。「你不是好人，你是一個反日的土匪！」而這個青年，很快地被處死了。

又一幕是鄉村的市上。小商人很平安地販賣他們的貨物。突然日本兵來了，搜尋「反日土匪」。馬上他們盤問護照，那些忘記帶着的人們，都被槍殺了。以後兩個日本兵大吃豬肉販子的肉。當他和他們要錢的時候，他們很驚訝的望着他。「你要錢嗎？這可怪了！蔣介石把滿洲、熱河、察哈爾給我們，塘沽停戰協定，何梅協定，冀察政務委員會給我們，沒有向我們要過一個銅板！而你爲一點肉便向我們要錢麼？」這樣他們就把他當做「土匪」用木椿釘死了！

最後一幕，自然，這些事情對於鄉村裏的人們是夠受的了。商人們推翻了他們的攤子和布棚，農人們帶了他們的槍刀衝了出來。婦人和小孩們拿着他們的刀子，一切人們都發誓和「日本鬼」作殊死戰！

這個短劇充滿了幽默和一些土語，與討厭及仇恨的罵街互相輪流着，引起觀衆的哄堂大笑。聽衆是很受刺激了。這對於他們不僅是政治的宣傳，也不僅是激動感情的戲曲，而且切合真理。事實上演劇者大多數祇是一些十幾歲的青年，山西和陝西的都有，但是劇情的深刻，觀衆在心領神悟之中，好像忘却他們是小孩子。

這種慘痛的劇情——用一種笑劇形式表演出來，可是它的真意是智巧和幽默不能隱瞞的。至少對於一個青年兵士是如此的。在完場的時候，一個兵士站立起來。用一種被感情震動起來的聲音呼喊道：「打倒日本強盜！」「打倒屠殺中國人民的劊子手！」「打回老家去！」整個人羣很有力地

回響他的口號。我後來知道這個兵士是東北人，他的父母雙親是被日本兵殺死了。

秩序單上的第二項是「收穫跳舞」，由戲劇社十二位女演員表演的。赤着腳，穿着農民的褲子，大褂，和相似的背心，頭上包着綢手巾。他們用整齊的步調，很莊嚴的跳着。我知道這些女孩子裏有兩個，完全步行由江西走來的。她們在瑞金紅色戲劇學校學習了跳舞，她們很聰明而有天才。

再一項奇特而有興味的是「聯合戰線舞」，牠的意義是解釋中國抗日的總動員。但他們用的什麼幻術，製造成他們的衣服，我是不知道的，只知道突然一羣青年穿着水手的短衣服，先是當做騎兵隊登場的，以後又當做空軍隊，接着當做步兵，而最後當做海軍。他們的姿態和手式，以中國人天生的藝術天才，很真實地表演出來。

還有一種叫做「紅色機械舞」。用聲音和手勢，四肢和頭的交叉，來表示。小的跳舞家們摹做着活塞，摹做着大小輪子的旋轉，發電廠的聲音——象徵着中國將來的機械時代。

在休息的時間，從聽衆之中起來了民衆的歌唱。有五六個本地的陝西女孩們——在工廠裏的工人——被大家的邀請，唱一個古的本省的民歌，有一個陝西的農民，彈着他自己的琵琶配合着。一個紅校學生拉着胡琴，並表演一種手提琴，另一個又被請求唱一首南方流行的歌。忽然，使我完全舉止失措，一種要求外國新聞記者的獨唱開始了！

他們不肯饒恕我。可憐的，很，我除了狐步舞，爵士舞，波希姆舞，和國歌以外，什麼都不知道。而這些

好像在這裏都不適合似的。我甚至連馬賽曲都忘掉了。他們堅持着他們的請求。在極端窘困之中，最後我唱了「飛行木棒上的人。」幸而他們都非常客氣的，使我下了臺。

我看見下一幕展開了，才覺得放心。這是一個以革命爲題材的社會劇——一個會計師和他的地主的妻子陷入愛情了。接着又有一些跳舞，關於最近從西南來的消息的「活報」兒童們「國際歌」的合唱。在這裏圍繞着一個光明的圓柱掛一串萬國旗，年青的舞者圍繞着牠傾斜着身子。他們隨着字句慢慢地起來，而當唱到結尾的時候，都站起來，高舉攢着的拳頭。

戲已經是完了，但我的好奇心還存有着，所以第二天，我去見危拱之女士——人民抗日紅色劇社的監督。

危女士二十九年前生於河南，已經做了十年的紅黨。她以先是參加「基督將軍」馮玉祥的國民軍宣傳部，但當馮和南京在一九二七年妥協以後，她和一些別的青年學生脫離開，參加漢口的共產黨。一九二九年她被共產黨派到歐洲，在法國讀書；以後又到莫斯科。一年後她回到中國，很順利地穿過了國民黨對紅色中國重圍的封鎖，而到瑞金開始工作。

她告訴我一些關於「紅色劇社」的歷史。戲劇組好像是五年之前開始在江西組織的，依照危女士的話，在那裏，瑞金的「高爾基學校」有一千以上從蘇區招集去的學生。紅黨訓練了六十組的戲劇隊。他們旅行遍了前線和各鄉村。每一隊都從鄉蘇維埃接到許多預定單。農民們對於在他們的

文化飢餓的生活裏的任何娛樂，永遠是非常感激的。爲這種貴客，總是自動地爲他們安排一切運輸、食物和住的地方的。

在南方的時候，危女士是助理指導員，但在西北她已經負責戲劇組織的全部了。自然她也參加了從江西出發的長征，是數十個經歷了這次長征的蘇維埃婦女中的一個，在南方的隊伍來到以前，在蘇維埃陝西早創立了一些戲劇隊。但從江西來了新的分子以後，顯然地戲劇的藝術，得到了新的生命。危女士告訴我，這樣的游行戲劇隊。現在已經有了三十隊以上，在甘肅還有些別的。以後在我的旅行裏，我遇見很多。

「每一個軍隊有它自己的戲劇組，」危女士接着說，「幾乎每一個區域也是同樣。演員幾乎都是本地召集的。我們從南方來的有經驗的演員的大多數，現在都成了教師。」

我遇見好幾個少年先鋒隊，長征的老手，都仍在他們十幾歲的年齡，負責組織並訓練在各鄉村裏兒童戲劇團體。

「農民們很遠地到我們的紅色戲劇社來，」危女士很驕傲地告訴我，「有時候，當我們離白區境界很近的時候，國民黨兵士們祕密地打發使者，請求我們的劇社，到邊境區域的市場鎮甸上去。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白軍和紅軍的兵士們，都放下他們的兵器，來到這個市場地方，看我們的表演。但是國民黨軍官們，如果知道了這事的話，永遠不會允許的，因爲如果他們只要看見了我們的戲劇，國

民黨的兵士們，不會再和我們的紅軍作戰了！」

可是，這些戲劇俱樂部最使我驚訝的，不是他們貢獻了對於世界任何藝術上重要的東西，很顯明地這事他們沒有做到，而是因為雖設備簡單，它們能夠適合一種真正的社會需要，他們有最少限度的器具和服裝，但是用這些最原始的材料，他們產生了許多戲劇的深刻幻像，演者只領受他們的食物和衣服，和一個很小的生活津貼，但是他們每天研究，像一切的共產黨和少年先鋒隊一樣，而他們相信他們自己是為中國和中國人民而工作的。他們什麼地方都睡。很高興地吃任何人替他們預備着的東西，從一個鄉村到另一個鄉村很遠地走着，從物質享受的觀點來看，無疑地，他們是世界上最可憐地領受報酬的戲子，但是我似乎從來沒有看見過再比他們還快樂的人。

紅黨們幾乎寫著一切他們自己的戲劇和歌曲。有些是由有天才的軍官們捐助的，但大部份由宣傳部的小說作家和藝術家預備的。有好幾個有名的紅色戲劇的諷刺劇，是由成仿吾寫作的，他是有名的文學批評家，三年以前參加紅黨的。最近還有一些是丁玲——中國最著名的女作家，寫作的。她現在和紅軍在一塊。

在共產黨運動裏，比紅色戲劇更有力宣傳武器是沒有的。而且也沒有運用得更巧妙的。劇目是常常改變的，幾乎每天改變的「活報」劇，新的軍事、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都成了戲劇的材料。而疑點和問題，用一種幽默的，對於狐疑的農民階級可以懂得的方法，來解答了。當紅軍佔領了新的

區域以後，也是紅色劇社，來平靜人民的恐怖，傳給他們紅色綱領的基本觀念，發散大量的革命觀念，去徵取人民的信服。舉例說吧，在紅軍的最近的遠征山西的期間，幾百的農民聽到了紅色的演劇者和紅軍，就成羣地來看他們。

危女士穿着乾淨的紅軍服裝，而且像一切蘇維埃婦女，她剪了頭髮。從距離較遠看來，你或者以為她會是一個整齊的紅軍軍官。但是仔細一觀察，發覺她是一個很漂亮年青女人，帶着一種媚人的笑，和一種很適任的能辦事的人的態度。我以為她可以是一個露茜·司脫恩諾，就問她是不是已經結婚了。她搖着她的頭發笑了。指着她的學生，她說：「一個丈夫能供給比我這裏更多的小孩嗎？！我還沒有結婚，革命沒有勝利，日本沒有打倒以前，我不會有時間為這樣的一種奢侈品的！」

而這正是紅色劇社目前的志願最好的總結。關於這事我不懷疑，是「在藝術中的宣傳」運用到最極點了。（Elgar Snow）

## 膚施的話劇與「活報」

由於國內和平運動的開展，複雜的陝北問題也隨之逐漸好轉，而達到將要完全結束地步了。筆者以交通無阻，春假得暇，特地遠遠從文化城——北平跑到陝北走了一趟，看看這裏究竟有什麼與外面不同。劇運方面，膚施給人的印象是活躍，新鮮，熱鬧；雖然亟待改進的地方很多，可是舊有的基

礎上已安置好了一個可發展的前途。這裏有些地方是外面所不常見的，值得國內戲劇家的研究與注意。尤其是在大家關心內地劇運的今日，這特殊地域中的劇運似乎不應當漠視吧！

自軍事告一段落之後，廣施城中成立了三個劇社。平凡劇社是由文藝協會主辦的，帶有較多職業性質。中央劇社和戰號劇社是由政治軍事工作人員和學生組織的，為純粹業餘的戲劇組織。後來，這三個劇會為增強實力來更進一步的推動劇運，特將三個原有的組織合併起來，成立一個規模大的人民抗日劇社。現在廣施一切的劇運，就完全賴較這個劇社推動，同時陝北各軍隊裏的戲劇組織，也多半要受它的影響。

這裏通常用的劇本幾乎都是已經在其他各地上演過的，像察東之夜，殺嬰，沒有牌子的人，撤退，趙家莊，回春之曲，祕密等等。

因為這裏演劇的目的在「文化」而不在「生意」，所以「賣票」和「退票」的麻煩都沒有，劇場雖然很小，票由劇社輪流贈各界，使大家都有看戲的機會；因之，更加深一般人對戲劇的愛好。

人民抗日劇社中除少數負責的職員是經常在劇社裏工作外，演員幾乎全是由政治軍事工作人員及當地的居民抽開來充任的。這些人們出身的社會階層不同，幹過各樣職業，處過各種地位，會經實踐過並且熟悉了種種不同的生活，所以表演時不必矯揉造作，自然而然給人的印象是真實，深刻，而能非常感動他們的觀眾。



農民劇由農民自己扮演，穿自己舊有的衣服，說當地的土話，做出自己很習慣的表情與動作，雖然沒有精緻的技巧與匠心的穿插，而成績卻很不壞。好比扮農民的主角在舞台上受到旁人侮辱的時候，而在舞台下的農民臉上立刻就反映出這戲劇的効果來，好像他們自己身受着侮辱一樣。這種情形——充滿着「現實主義」的，色彩戲劇在膚施——往往使演員和觀衆打成一片。

除掉扮演漢奸的不是由真漢奸扮演外，其他的各種演員都忠實地表演了本身曾經實踐的生活，從各種的生活姿態中反映出整個的中國社會情形，這樣，戲劇在膚施除滿足觀衆娛樂上情緒上的要求外，更盡了很大的教育任務。人民抗日劇社以前的負責人是危拱之女士，我在施諾（Edgar Snow）先生的照片上見過她，但我到膚施的時候，她却恰巧不在，而劇社是由木刻名家溫濤先生主持。

溫濤先生是一個多才多藝的矮個子，能夠作畫、製曲、編劇、導演。劇社中大大小小的事，好多是由他親手來做的。有時，丁玲女士、奚如先生、成仿吾先生等也來帮他編選一點劇本。演員，以廖承志先生（先烈廖仲愷先生的長子）、朱光先生、施月琴女士最受觀衆的歡迎，據說他們在戲劇方面努力有長久的歷史了。

當我到達膚施之次日，恰巧當地開「晚會」表演新排的話劇最後的祕密，因為我們是遠道而來的客人，所以也在被邀之列。晚會原定下午七時半開幕，我們在剛過七點的時候到會。那時，會場中

前前後後即已擠滿了各色各樣的人：老的、小的、男的、女的、農民、兵士、政治領袖、小商人什麼都有。外來的人除筆者一行數人外，還有幾個從上海來訪問的新聞記者。會場原為當地基督教禮拜堂，面積祇有上海青年會裏的游泳池那樣大，可是與會的人卻特別多，大家只好依靠了坐着立着。同時窗戶又不夠大，空氣不十分流暢。可怪的是觀衆不但不感覺侷促，反而十分高興，也許他們生活太不「富麗」，對於娛樂的要求的迫切，是遠過於上海大光明看美國大腿以消閒永日的紳士淑女們吧？當舞台尚未開幕的時候，台下擁擠着的觀衆同聲唱出粗壯曲——這粗壯的巨聲，可又叫我親切的重溫了一遍「一二一六」衝開北平西便門的故事了。

膚施沒有電燈，小小的舞台上主要的燈光只是一盞煤氣燭，燈旁邊還繫着兩個紅綠布袋。當舞台上燈光需要改變的時候，在後台的人只須拉動那繫着紅綠袋的繩子，那燈光的色彩便立刻改變了。老實說，這種裝置比上海下等「舞台」的「燈光」都不如，可是在膚施却給這些無福可享的人們以滿意的光明。煤氣燈之外，次要燈光是蠟燭，在很大的紅紙燈籠中燃燒着。燭焰的跳動，令人飄飄然回想到一百年前的舞台。舞台前面的邊沿上，用十幾盞小煤油燈排成一條弧線，在每盞燈朝觀衆的一邊罩着一個用煙捲包中的錫箔紙製成的「凹鏡」，好收到使燈光照向舞台的效果，這，據說是溫濤先生創造的 Foot Light。

一會兒話劇父子兄弟開始了，偽滿統制底下的同胞慘痛的生活，在簡單的佈景和懇切的表情

中顯示出來。劇情是東北某甲原有快樂充裕的家庭，自經濟陽事變後，由於暴力的壓榨，家庭便毀滅了；母親死去，父子離散，哥哥由飄泊而入義勇軍；弟弟爲了養活父親，都做了以違背自己良心，捕捉義勇軍爲職業的警察。帝國主義者最毒辣的手段是利用中國人殺害中國人，所以做偽國警察的須要像獵犬般成天的幹着不人道的的工作。某天正當父親偶然出門的時候，哥哥從遼遠的地方回來了。弟弟自小就不曾見過哥哥，不認識這陌生人是自己的骨肉，因此，一見他舉止乖特且暗藏着手鎗，便執行自己的職務而嚴重的盤問起來。這樣，由於兩人衝突的結果，弟弟便把哥哥打死了。後來父親回來說明哥哥的淵源，弟弟纔明白原來自己替敵人把哥哥殺死了，因而慚愧憤恨交集，自己便也決然去參加了義勇軍的隊伍。

這短短的獨幕劇用極真切的表情演出，觀衆緊張的心情隨着劇情的起伏不能自己的感覺着哀痛、憤恨、惋惜、激怒。五年來羞慚的恥辱，在每一個人的心上重新烙上一道新痕。

第二幕劇是最後的祕密，描寫西班牙內戰中叛將弗郎哥部下虐待工人的慘狀和工人奮鬥的英勇。啓幕時一個幾天沒有飲水祇以鹹魚爲食糧的工人在受審，法官（弗郎哥部下）用白水引誘他供出祕密印刷所的地址，可是恐嚇和引誘終久不能從受審的人把祕密說出來。法官無法可想，又去審第二個工人，第二個工人意志比較薄弱些，加以受過長久的毒打和苦刑，神經已經昏亂。祕密幾乎從他嘴邊漏出來了。第一個工人看見情形不好，忽然改變他一貫的態度，說自己願意答覆法官一

切願意知道的問題。但要求以能夠釋放他並且能資送他逃出西班牙爲條件。

這樣妥協的談判開始了。凶狠的法官高興的爲這工人預備逃往美國的船票和現錢。當這工人正要全盤供出一切祕密之前，他又提出另一個要求：請求法官先殺了他的同伴，以滅絕將來足以宣傳他『告祕』事情的口證。這要求在法官微笑中立刻答應並實行了。鎗聲在窗外響後，這工人竟突然出人意料的大笑起來，且說：『祕密原來只有我二人知道，我見他神經昏亂，快要說出印刷所的地址，所以我趕緊借你們的手掩住了他的嘴。爲了祖國的自己，和獨立，爲了全世界人類的正義與和平，我不得不犧牲了一個親愛的同志！當然，我也得死，可是死，那又算什麼？我敢說，一個青年能死在這偉大的鬥爭中，至少是光榮的事！』

在舞台下面熱烈的喝采聲中，西班牙政府軍已神速地攻入叛將的營帳，把工人奪回了，劇本也就此結束，這幕劇比父子兄弟場面較大，對話較多，一貫的熱烈情緒，比較前面一劇更緊湊，我相信它給觀衆的刺激也是更深刻。

當兩幕話劇演完之後，接着表演我們未曾見過的『活報』。『活報』是戲劇中一種輕騎式的短小雜劇，內容包括唱歌、對白、舞蹈、演說，並且配有音樂。由一羣天真活潑的小孩子表演，做得非常有趣。『活報』的任務是隨時以趣味的方式報告新的社會情形，政治消息，學術思想，和『報告文學』具有同樣的性質和優點。它不需要佈景，不用特別的衣飾道具，處處可以因環境之需要而演出。用篋

子敲飯碗，用鐮子替代梵亞林，用洋鐵罐作鼓，用木棍擊破缸，可以配合成一組很齊全的音樂隊。在秋收的農場上可以出演，在盛大的會場中也可以出演，把新的內容用土語灌入當地最流行的歌調中，所以，很容易流行普遍。假若導演者更能好好注意於腳本的情節和當地的風俗習慣之特點，那自然更能受內地生活枯燥的觀眾們歡迎了。

這種「活報」原先由蘇聯介紹過來的，在十月革命二月革命的前前後後它曾經切切實實盡了它極大的「喚起民衆」的任務。兩次五年計劃之推行，集體農場之創立，「活報」也建了很大的功績。在目前積極要推廣民衆教育的中國，這種「活」的「報告藝術」實有讓全國戲劇家努力研究的價值。並且更有普遍介紹到中國各方面各角落的必要。熊佛西先生是現在努力提倡民衆戲劇運動的人，時常感覺在農村開展劇運不易，我以爲像「活報」這種輕而易舉的小雜劇，恰恰可以補救農村物質設備不夠的缺陷。在國家貧窮一至於此的時候，我們恐怕不能希望全國農村中都很快的遍立舞台吧！此外，「活報」能利用舊有的民間歌曲和皮簧的腔調，更能吸引民間普遍存在着的音樂愛好者。最近顧頡剛先生在努力改編鼓詞，據說在民衆教育上已獲得很大的功效，我以爲僅僅改編鼓詞似乎尚不夠，假若在唱鼓詞的時候更益以化裝的表演和趣味的穿插，一定能發生更大效果。

話扯遠了，該說回來。當晚「活報」的表演：第一幕是聯合戰線，啓幕時爲一個日本人分頭向幾

個兄弟挑撥，令他們互相打打，一等到兄弟們打得你死我活時，奪取他們的家庭。後來，大家發現日本人和漢奸的陰謀，纔知被騙了，拉起手來接成『聯合戰綫』同打日本人。

在表演這幕『活報』的過程中，音樂幾乎是不斷的在奏着。調子大都是陳舊而普遍流行於民間的。坐在我旁邊的一位鄉下老者能夠很快樂的點頭欣賞它，並且不斷的拍着自己的大腿叫好。有些穿插是很滑稽的，引得全場哈哈大笑。表演日本人的裝出種種兇惡神情，又引起大家的憤恨。記得最後在結束時大家還唱着這樣兩句：

3 4 3 5 0 6 3 | 2 3 2 4 5 — | 3 6 1 5 — | 6 1 1 0 2 3 |

我們的  
新時代  
到了  
同胞們

3 1 2 — | 3 5 — | 5 1 — ||

快快

抵抗

第二幕丁玲舞，是一幕簡單的歌舞活報，注重歌聲舞步的美，並沒有什麼意義。第三幕是音樂會，一排穿白衣的孩子蹲在地上代表琴上的鍵，由另一個小孩次第在他們身上按如同彈琴一般。台後風琴發出聲音，我們幾乎以為是從這些蹲在地上的小孩身上發出來的。這些人樣疊成的風琴作奏許多歌曲後，變換形式成爲其他的樂器又奏了新曲數只，完成了『音樂會』。

最後的『活報』是陸海空軍總動員：陸軍先出場，一羣小孩扮成陸軍隊伍進行的式樣，高喊：『我們是抗日的陸軍！』次有海軍出場，一羣小孩扮做划船的姿式，高喊：『我們是抗日的海軍！』最後是空軍，一羣小孩接連疊成飛機模樣高喊：『我們是抗日的空軍！』陸軍海軍空軍集合在一起，操演了很多的陣式，然後齊喊：『陸海空軍大聯合，一齊抗日！』

『活報』演完，晚會散了。在靜悄悄的深夜，溫濤先生把筆者帶進舞台後面他自己居住的屋中。在微弱而且搖曳不定的燭光下，這木刻專家的破木桌上擺着一瓶自延水邊岸折來的鮮豔桃花。白煙俊霧一般的由桌下土洞鼻騰，溫先生用一只紙煙罐子煮着他自南洋帶來的咖啡。

在隨便的閒談中間，溫先生除掉雜述一些自己的生活情形和丁玲最近的逸事，多半是關於膚施的文化界近況，而戲劇方面的設備缺陷是他所苦惱的事。台上道具沒有不算苦，甚至胭脂在陝北也不能夠多得。且喜『活報』處處不爲物質設備所限制，而且日盡設進。在他很自信的輕快語調中，我知道『活報』已經普遍的推廣在陝北一帶了。

受着時間的限制，我們不能在膚施多留，在參加晚會後的第二天便離開這萬山之中的小小城池了。在最近的將來，我相信膚施和西安之間的交通更會方便些，那時，膚施的戲劇情形一定更能清楚的爲大家知道，而外面能助長膚施話劇改進的力量，也會透入那邊每一幕劇中去。

## 陝北的工業

離開保安西北幾日路程的吳起鎮，乃特區工業的中心。

在這中世紀的世界中，忽然碰得特區的好多工廠，並且可以看到好多機器在轉動，和一帶工人在匆忙地製造各種貨物與工具，是使人驚奇的事。

我曉得在江西曾發展工業。他們經營中國產量豐富的鎢鑛。在吉安的中心×××印刷廠，僱用了八百以上的工人。許多書籍雜誌以及一個很大的報紙，是從那兒印刷出來的。

在江西還有紡織工廠及小規模機器工廠。小工業生產相當多的工藝品以供給他們簡單的需要。惟大部分的製造，還是用手工業和家庭工業造成，由生產合作社來推銷。

不過在西北，我完全沒有料想到會有什麼工業存在。在這地方共產黨遇着較南方更多的困難，因為在特區建立之前，這一帶原來即連極小的機器工業都沒有。在所有西北各區，如陝西，甘肅，青海，寧夏，與綏遠，其面積相當於歐洲這樣大，而其機器工業投資，總數還不到福特汽車公司一個大的聯合廠這樣多。

自然特區的封鎖防礙了機器的輸入和工程師的招請。關於後者，他們說，現在的人數已經很夠。可是機器與原料却比較是嚴重的問題。僅爲了得到幾架車床，織布機，引擎，或廢鑛的獲得，第八路軍



會打了好幾次仗。差不多可以稱得上機器這名稱下他們所有的東西，都是搜獲得來的。舉例來說，去年山西之役，他們獲得不少機器、工具和原料，這些東西都是用騾子經過陝西萬山重疊的道路而抵達他們使人難於置信的以巖穴爲房屋的工廠的。

南方的共產黨，到西北後，急謀工業的發達。他們隨身帶着好多車床、迴轉機器、鑄模機、碾穡機等。他們帶了幾打勝家公司的縫衣機，現在衣服工廠就賴這種機器供給；他們同時帶了在四川時所用的金銀、和石印機與簡單印刷機。

特區工業包括成衣廠、軍服廠、製鞋廠與保安及甘肅省河理灣的紙廠，長城邊境定邊的氈廠，以及出產中國價格最低煤的永平（鎮名，在延川膚施安定之間）的幾個鑛產，以及其他幾個縣內的毛織廠和紗廠——這些工廠都計劃着盡量生產陝西甘肅蘇區四百個合作社所銷售的貨物。現在工業計劃的目的，據人民經濟委員毛志敏（譯音）說，是使特區經濟自給。——卽在任何封鎖下，也能生存。

特區最重大的國營事業爲寧夏沿長城的鹽池地方的精鹽製造與永平延長的油井，這油井生產汽油、揮發油、凡士林、臘、臘燭及其他副產品。鹽池的鹽層是中國最優良的，當第八路軍駐紮該地後，允許將一部分的產鹽給長城以北的蒙古人，極獲得他們的好感。陝北的油井是中國唯一的油井。當駐紮永平後，第八路軍加掘了兩個井，生產比原來增加百分之四十。

吳起鎮不但是特區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更其重要的是第八路軍主要兵工廠所在地。

吳起鎮的兵工廠，像抗日大學一樣，是建造在山側一帶地窖中。這些房子是清潔的，空氣流通的，光由壁上溜下來，並有最大的優點，那就是防空設備極為完固。在這地方，我看到一百個工人做手榴彈，小鋼砲，火藥手槍，小砲彈槍彈，甚至幾種農具也在做。修理部則為從事損毀的步槍機關槍自動步槍與輕機關槍修理之用。但兵工廠的出品是很粗劣的，出品的大部分為別動隊之用，正式第八路軍兵士大都是用着奪來的槍械與彈藥。

在吳起鎮兵工廠之外，還有幾個成衣廠與軍服廠，一個製鞋廠，一個製襪廠，與一個配藥廠與製藥廠，有一個醫生在主持。他是一個剛從山西醫校畢業的青年，他的年青的漂亮的妻子和他在一起做看護。他倆都在去年冬山西之役加入第八路軍。

除開在兵工廠與軍服廠的工人以外，大部分的工人都是十八歲到三十歲的青年的女子。中國特區的口號是「同等的工作，同等的待遇」，揣想起來，對於婦女並無工資的差別。

工人狀況，大概每個工廠工人，每月可得十元至十五元的工資，食宿由公家供給。每天工作八小時，每週工作六日。當我參觀的時候，那些工廠都工作二十四小時，換三次班——恐怕是中國最忙的工廠了。工人享受免費的醫藥，受傷者並可得津貼。女工生產前後，可得四月休息，工資照發，並可支取部分的社會保險。保險費的來源是從平常工資中扣除百分之十，政府再加上同樣數目而來。政府並

捐助全部工資百分之二相等的數目，以爲工人教育娛樂等之用，這些基金是由工會與工廠委員會共同保管。

這些自屬很進步，雖則或許與共產主義的烏托邦還相去太遠。事實上這些條件在特區生存鬥爭的時候而能實現，是實在有趣味的一件事。他們所實現的是多麼原始，那完全是另一件事！他們有俱樂部，學校，極大的寄宿舍，自然這一切都在穴居室中，只有泥地而無地板，沒有淋水浴，也無電燈。他們所吃的食物，只有玉蜀黍蔬菜及偶然間有點羊肉，沒有茶，沒有糖，沒有牛奶，也沒有咖啡。他們無問題可以拿到流通特區貨幣以爲工資，與社會保險，但他們用這貨幣所能買到的用品却嚴格限制於必需品上——並且即連這些也沒有人能夠多買。

「不能忍受！」普遍的英美工人也許要說。但對於這些人，却顯然不是這樣。你要明瞭原因，你得將他們的生活與中國其他地方對比一下。

這樣，對於吳起鎮的這些工人，雖則怎樣原始，這兒至少總有着一種健康的，有運動的，有新鮮山地空氣的，有自由的，有尊嚴的與有希望的生活，並有開展的餘地。他們曉得沒有人從他們身上找錢，我想起來他們覺得他們爲自己而工作，爲中國而工作，而他們也說，他們是革命的。在這樣情形之下，我明白他們爲什麼每天這般認真費兩小時讀書寫字，這般認真對於他們的政治演講，和戲劇團體，以及爲什麼對於那一點爲團體或個人運動，比賽識字運動，公共衛生，壁報，工廠效率等而設的可憐

的獎品激烈競爭的原因。

所有這一切很難使我這樣一個中國老手置信，雖則我不能抹煞我見到的證據，我仍不能深明其終極的意義。爲了節省篇幅起見，自不能一一詳加列舉。

但當我寫此文時，我偶然記起了一件奇特的事情。我曾在那兒遇見一個電機工程師。一個出色但是十分嚴格的共產黨，名字叫做朱子齊（譯音），他懂英文德文，他是一個電力專家，他曾寫一本工程教科書，中國各地採用的很廣。他有一時期任職上海電力公司，後復任職慎昌洋行，一直到最近。他還有一個一萬元一年的職務在南中國，在那地方，他是任顧問工程師，後來他放棄了這職務，離開他的家族，到了陝西荒山中，爲紅軍服務，一些不貪圖什麼！真是不可思議的事！這件事的根源是由於他的敬愛的祖父，一個寧波的慈善家。他將死的時候，囑咐青年的朱「爲大家提高文化水準而獻身。」於是朱認爲最快的方法就是這條路。

我想來，朱這樣幹，有些像傳奇故事一樣，是出於殉道者與宗教家的精神。對於他，這是一件極神聖的事。他過去想，也許會早死，他希望別人也那般想法。我相信他是有點吃驚，當他看見充滿了這極多的他認爲粗俗的娛樂，而每個人都很快活。當我問他作何感想，他嚴重的回答我說，他只有一個不客氣的批評，那就是：「這些人化費了太多的時間在唱歌，而現在還不是唱歌的時候呀！」（Dr. Gar-

SHOW 原著，奉倩譯）

## 陝北行中之印象

西安裏面 誰都知道「雙十二」以後有重要共產黨人入西安，甚至於認為「雙十二」事件完全是共產黨操縱的局面，所以事變後許多人恐怕蔣委員長被挾持陝北則情形將更棘手。總之，稍有幾分政治素養的人，對於陝甘大局，比較看重共產黨在其中的關聯。

記者於事變後奉社命從綏遠到蘭州，因已確知周恩來在西安而且知道西安附近，曾到過彭德懷賀龍等的部隊，我很想藉此機會，會會這般神祕的人物，一探政治究竟。

二月二日到西安，被突發的事變關在城門外，三日進攻，一般人風聲鶴唳都在懷疑共產黨，我也有幾分相信。但是西安的朋友，真正見過周恩來的，還是不多。

四日午後經朋友的介紹，我們在楊虎城公館看到周恩來先生，他有一雙精神而樸質的眼睛，黑而粗的鬚髮，現在雖然已經剃得很光，他的皮膚中所藏濃黑的髮根，還清晰的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帶，腳纏綁腿。口音夾雜着長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談話的口音判斷，很有點像江西人。

因為旁的事情，我們當天不能作詳盡的談話，我們約到第二日作竟日之長談。談話的題材，當然首先是關於西安事變。

陝北紅軍問題之由軍事的走向政治的，還是中央開的端。二十四年冬，中委××奉命由西安飛膚施，轉入紅軍區域接洽，即為觀察紅軍之動向者。那時膚施前線為東北軍王以哲部，此事遂壯東北軍與紅軍自由接洽之膽，王以哲首先與紅軍幹部發生關係。二十五年夏季張學良乃與周恩來在膚施正式見面，討論張所提出之兩大問題：第一，蔣委員長與抗日關係問題；第二，用法西斯方法謀中國之統一問題。周對第二點認為難能成立。因為無論名義如何，中國在實際上難有法西斯政治之存在。至於前一點，共產黨由土地革命的階級鬥爭，轉到各黨派聯合抗日的民族革命，已經變了一步。但是那時共產黨的『抗日』還是『反蔣抗日』，即要能『抗日』必先『反蔣』，即不推翻蔣之統治，無法抗日。張周見面之後，張之見解，以為『抗日』非『擁蔣』不可。不擁蔣，無法抗日，而對蔣委員長之艱難計劃與準備，就其所知者以告周，頗使周發生相當影響。

共產黨在陝北之中央委員，已不足法定之全體會議人數，臨時最高之決定機關為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得到周恩來之報告，引起極大之論辯，結果，參考張學良所提供之新材料，與將國內外大勢重加研究的結果，認為有轉而『聯蔣』進至『擁蔣』之必要。

這樣轉變的政治路線，就是『統一的民族戰線』對內主張和平統一，對外主張團結禦侮。

基於此種根本政治立場，共產黨乃力謀對國民黨之政治妥協，化除彼此間絕對政治和軍事的對立，張學良與周恩來正式接洽之後，共產黨意中希望以張學良為媒介，以與蔣委員長協商，誰知張

學良之政治技術運用未能靈巧，終於爆發了出人意外的「雙十二」事變。

張楊對於「雙十二」事變，認為是「兵諫」，一部青年羣衆認之爲「革命」，謂爲抗日的第一步。共產黨當雙十二事變發生時，中央機關還在陝北保安，他們得到事變的消息，許多人最初一秒鐘的決定，是感情的報復主義，主張派人入西安，速蔣之死。然而接着是理智克服了感情，認爲張楊如此作法，殊欠妥當，蓋雙十二事變，既非如帝俄時代羣衆革命之打倒沙皇尼古拉，又非類似滑鐵盧戰爭之俘虜拿破崙，此僅以一種不光明不道德之「軍事陰謀」，劫持領袖，第一，與中國當前團結禦侮的需要相反。第二，構成今日蔣委員長之政治理論，政治組織和一百餘萬之中央軍，仍然健在。則此事之前途，只有發生更大規模更長久之內戰，對於國內和平統一，將致背道而馳，愈跑愈遠。但是既然木已成舟，理論上的問題已經無用，當速謀補救的辦法。周恩來乃於十二月十六日由膚施乘張之波音機到西安，卽向張陳釋蔣之必要，同時更親自與羈陝中央要員見面，作各種政治協商。

十二月二十五日蔣突在張陪送之下，飛出西安。許多青年羣衆，突聞此事，大爲震動。比較消息靈通一點的少壯軍人，非常不滿意周恩來這種作法。

張同蔣到京之後，卽未西返。東北軍少壯派之感情，極度不安，又聞張學良被審消息，羣情更譁。而和平初步辦法，已商有成議，周恩來爲主張接受和平條件最力之人。「雙十二」事變，打死王以哲之後，周自己似亦因此不得不移住作爲臨時租界的楊虎城公館。

關於第三國際對於中國共產黨轉變，採何種態度問題，周恩來謂自第六次大會以後，第三國際曾決議各國共產黨應注意各該國之民族性與地方性。七次大會以來，此事更無問題。

至於若干人主張之「立即抗日」與「反準備論」，周謂爲皮毛之見。無計劃的，無準備的對日作戰，是自取覆敗。不過，準備應在對內不戰爭，而在和平統一條件之下，始有其意義。

他說共產黨此時之政治目標，在爭取黨的自由，希望不致於再被任意逮捕，政治上希望慢慢走上民主的道路，則共產黨放棄反對國民政府的武裝暴動，取消蘇維埃，同時紅軍取消名稱，並服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領導。

他們對於張學良個人，認爲他是非常聰明與勇敢，政治感覺異常敏捷，可惜經驗不夠，弄出「雙十二」這樣大亂子來。

因周恩來先生的介紹，到西安新城後面上賢莊從前一位德國牙科醫生的診療所去看葉劍英先生。無疑的，這是一個共產黨當時在西安的半公開機關，僅僅一層的西式洋房，大門進來，有一個小天井，正屋裏有許多青年人緊張的工作着，有的從這個屋，走進那個屋，有的聚在一塊談話，有的很忙碌的操縱無線電，這部無線電機似乎專爲祕密工作用的，天線沒有顯在外面，同時發報聲音很小，這羣人的服裝，非常隨便，儀貌上除了熱烈的表情外，沒有什麼嚴格的禮節。

「劍英！周恩來向着一位正在紛忙的人招手。」



隨着周恩來的招呼聲，一位三十左右，精幹結實，相當瘦長，穿學生裝，戴八角帽的漢子，和我一齊進入一間小辦公室裏。

葉劍英的風度，有幾分西洋人味道，廣東東江人的口音，還多少存留在口邊。民國十六年廣州暴動的基幹是那時張發奎先生的教導團，而葉劍英是張發奎最相信的參謀長，同時亦爲策劃與指揮廣州暴動的最中心人物。張發奎先生事前對葉毫不疑惑，依爲腹心，則葉之政治軍事技巧，不能不稱爲相當老練。

「雙十二」之前，葉曾應張學良之邀，祕密來西安，在張學良公館附近，與張研究東北軍之改造問題，葉對於東北軍之政訓工作提出意見。他之說法，很使張學良受影響。

他那時認爲政治的統一戰線成功之後，共產黨對紅軍之政治領導，仍然存在。因爲如果開始了抗日戰爭，軍隊政治工作應有加強的必要。

「雙十二」以後，從太原來陝的張慕陶，極力反對周恩來之和平妥協辦法，他主張維持「抗日聯軍」召開和平會議，周恩來爲此和他們辯論很久，結果是各行其是。二月二日事變之發生，在思想上很受他的影響。

對於是否即刻對外戰爭問題，周恩來謂紅軍不願過早挑動對外戰爭，因此紅軍入山西之後，雖唱「過境抗日」之口號，而並未全力出綏遠，原因卽在於此。

途中所見 西安政局，既已開展，記者又奉命入陝北，二月六日在博古先生和羅瑞卿先生陪送之下，開車直駛膚施（延安）。兩輛載重車，載些鞋子衣服等，我和博古車上，裝了一車的『左派幼稚病』小冊子，最重要的是從紫金山那面飛來的幾十萬法幣。同行有西安新聞界和學聯的朋友。

那天城內外的東北軍和陝軍都在紛亂的撤退，汽車大車牛車毛驢，什麼交通工具都有，而運送的東西則從軍火軍實至破鐵爐子也全帶上，真是澈底的搬家，秩序異常零亂，大概撤退命令太倉卒一點。陝變主力的特務團士兵，更是無精打采的退出西安，低着頭，倒拿着槍，好像不勝頹喪的樣子。

咸陽至三原途中，遇到許多徐向前舊部，他們是被胡宗南關麟徵腰擊而沒有渡過黃河的隊伍，現歸蕭克率領着，他們多半是四川人，聽不懂博古的話，我還作了一次翻譯。

西安三原間，要經過三個渡口：第一是渭水，有橋可渡。第二是涇水，有船可渡。第三是涇惠渠，那時可以涉水而過。路上往來的車輛很多，因為撤兵的原故。

三原附近，零星的住些紅軍，黑軍衣，黑軍帽，帽上有紅星，是他們外形的特點，他們多半是年青活潑的人。普通軍隊的形式軍容，看來他們很不注意。

那時三原城，成了小西安，許多西安原有的團體，如全國救國會西北救國會等都移到三原來了。許多青年都紛亂的向渭河北岸三原一帶跑，他們對於中央軍入西安有些過份的恐懼。

因為等保護的部隊，恐怕路上遇到土匪，費去很多時間，當晚住三原。大餅和開水解決了晚飯，一

間小客店的小屋土炕上，還睡着我和博古兩個人。

傍晚在三原街上還遇到葉劍英夫婦，他是到附近二十重雲陽地方的彭德懷那裏去，他穿着學生服安閒在街上走着，誰也難以看出他是作戰異常果斷的舊任紅軍參謀長。

我們坐的那輛車子，是紅軍自己買的。在西安事變前十個月，已經掛着王以哲軍用車牌子，在西安延安間往來運輸。西北之必然會出亂子，已不是西安事變前短時期之醞釀了。

博古那時談紅軍將來之地位，謂名稱編制更易之外，原有領導幹部應維舊狀，政治委員可以由中央派去。因為政治委員制度，來自蘇聯，蘇聯革命初期，紅軍缺乏軍事人才，故不得不利用有軍事技術之舊軍人，而用忠實黨員為政委，居監軍的地位。中國紅軍之軍事幹部皆為黨員，故不必要政委也。七日起身，各人自己收拾行李，不出十五分鐘，博古的行李已自己弄好了，這是長途行軍練成的，汽車夫反而落在後面。

同店有位六十八歲的老人，他要去當紅軍，他無論如何吃不消的，理由是在西安參加過救國會，他聽說恐怕將來『不得了』

三原北去有許多台狀地帶，九十里至耀縣，耀縣城外有一座新式大木橋，橋基堅固橋身寬敞，有些重要國營公路還不及牠，陝省公路建設當局，至可敬佩。

縣城裏有許多紅四方面軍的人，他們過半是單褲，最多不過穿棉衣，問他們，答案是：『多了不好

跑路。』我們穿雙層皮的人，完全是平日少鍛鍊之工了。

城內商業照樣維持，原因是紅軍對於社會秩序，已採取維持現狀的態度，他們行動的事實，已在商民中建立信仰。

三原到耀縣從前架有輕便鐵道，供陝北剿匪軍運輸之用，現在和平解決後，這修鐵道是無的放矢了。

同官以上，進入山道，所謂『山北』區域，從此開始，陝北和關中就在這裏分界。同官至宜君完全在山溝裏走，有好幾十座水門汀橋，修得整齊美觀，皆陝省建設之成績，山行不遠，即到宜君。

不妙的是在不到宜君十里左右油房台山上把車壞了一輛。只好放下些東西，把人先用一車帶走。

壞車處，小山村老嫗出來關照我們：『諸位老爺以後過車，請留心我的孩子，不要把他壓着了！』他不問我們是如何來歷人，專是想到她自己的事，專為她自己打算。一切皆為自己打算，這是人生和宇宙的大法則的流露，也就是『約法三章』和『為民請命』這一套所以成功的原因。

宜君位於山上，小得可憐，開水無地喝，而鴉片則到處皆有。縣政府又在縣城山頭上，這完全是古代戰爭城堡的修築法，不合於經濟生活的原則。

七十里至中部縣，穿城不過半里，和宜君有難兄難弟之分。宜中兩縣都在破碎的黃土高原之中，

陝北貧瘠本相，至此一目了然。

車到洛河渡口名交口河地方，大冰衝壞了便橋，過不去，而修橋亦非短時可能。我們一面派人至洛川打電到膚施要車，一面尋附近村莊過夜。破土鑿洞裏，又成了高談政治的地方。

紅軍士兵的生活，仍然比官長要苦些，不過和旁的軍隊，程度有差別，將來軍費充足後，相差的程  
度怎樣，還待事實的表現。

涉冰過洛川，八日住洛川。縣城在原上，張學良指揮剿匪，曾坐鎮於此，今則紅星帽士兵隨處可見。紅軍初到陝北時，不懂方言習慣，他們夜間駐營，總向民間借門板等作臥具，所以常向婦女說：「老板娘你的板子借我睡一吓。」她們必起異常羞懼與不安答應一個「不」字，當然這邊再行說明理由的繼續要求：「板子睡了退回你還是好的！沒有關係！」而他們所得的回覆是：「我怕！」原來陝北所謂「板子」是指女人特有的生理部份，當然她們不能隨便借給人睡了！

紅軍的政治工作相當成功，送我們的士兵，誰也可以講一篇大道理，「帝國主義，」「殖民地，」「革命」……無比其多的新名詞，他們講得無不順理成章，儼然受過多年政治教育。

這些年輕的紅軍官兵，說起打仗完全是兒戲，沒有緊張意味。好像中學生談賽足球，李惠堂那一脚踢得如何有勁，葉北華如何傳了一個好球。少年和青年人的精力充足，只要燃起政治的火燄，他們的戰鬥力是無限充盈的。

在洛川縣政府裏過夜，木炭餘烟，把我昏迷了過去。我心裏明白，只是動不得說不出話來，而且呼吸急促得快要不能繼續，我感到危險，拼命掙扎，好不容易滾下了床，開了門，爬到室外雪地呼吸冷空氣，幾分鐘後，才恢復了清寧，幾幾乎走上了丁文江先生的老路！個人生命實在容易毀滅，不及時作些事，很快就告結束了。

晚間會大雪，九日赴膚施途中，只見大雲蓋滿山谷。汽車行經破舊的黃土高原，上下三個峻急的山坡，不是機器完好的汽車萬萬上不去的。

鄜縣城外汽車站旁，有飄紅旗的紅軍聯絡站，他們相互問「同志」「同志」的稱呼，態度非常親切。

鄜縣北行不遠，公路旁有泉水湧出，結冰蓋路面，下臨高崖，滑溜不怕，車行其上，直賭命運，此後道路，乃順洛河東岸北進，以趨甘泉。河東西山頭上盡爲碉堡。村莊牆院亦已完全礮堡化，皆東北軍剿匪時之陳跡，而今大有人去樓空之感矣。

甘泉縣不及內地中等村莊之富厚，城內房屋凋零，人家無幾，縣長無多少事可做，蓋鄜縣以北，已成蘇區，田地皆經分過。另有蘇維埃政府管理，縣府運錢糧等亦收不到，縣府經費，全恃省府津貼維持。午尖於甘泉紅軍聯絡站，腹饑甚，麵條煮好，皆虎嚙狼吞。

甘泉是過去剿匪大戰之場，東北軍某團長被擒的榆林橋，何立中陣亡的勞山，紅軍中人皆爲我

們指手劃脚而道之。

甘泉再北去膚施，路與洛河分離，另遵谷道進，谷中平日有四川人利用山中泉水種稻。谷盡，過富有森林之山峽，出峽，順北谷下，沿途人家稀少，土地荒蕪，村莊殘破，無一不象徵大兵之後者。沿途標語，極爲劃一，有『統一戰線』標語，有『一致抗日』標語，有『改良工農生活』標語，最多不過十幾種。絕無反國民黨，反國民政府，及反對蔣委員長標語，打倒『土豪劣紳』，『平分土地』的標語也沒有。

將至膚施，遇到近日的徒手紅軍，係下鄉打柴作燃料者。武裝殘破，單褲居多。十四五歲小孩不少，他們在路上到處打打鬧鬧開玩笑。

膚施人物 抵膚施，先至城外外交部接洽，旋入城，滿街是黑衣紅星青年人，服裝較外間爲完好。商業亦較熱鬧。下車至紅軍大學休息。

紅大那時已改爲『抗日軍政大學』。校裏首先遇到的是林彪先生，現任紅大校長，對我要算地主之地主了。他是三十歲剛過不遠的人，穿一件灰布棉大衣，中等身材，冬瓜臉，兩眼閃爍有力，說話聲音沉着而不多言。不過，無論意見與用詞上，他的立場很堅決，一點不放鬆。他領我去看他們學生的活動，有些在打乒乓球，有些在打籃球，教官們和他們混在一起，沒有人介紹，很難分別，因爲服裝都是一樣的不好。寢室內務，大不講究，官長學生之間，也無多禮節，他說他們不贊成形式主義的。自然他們是以

蘇聯紅軍作藍本，而蘇聯紅軍的兵學原則，是法國拿破崙的遺留，重自由，重活潑，和德國兵學派的重形式者，完全相反。日本學德國，中國有些部份又是學的日本。紅大的教育方針，是自動多於被動，討論多於上課，室外活動很注意，每日上課時間，最多不過三四時。

其次和我見面的是宣傳部的吳亮平先生，他小小個子，清秀的面龐，無論他吃過多少苦頭，還保留着書生面目。他的外國語文很漂亮，蘇區對外英語廣播就是他擔任。他說話是清晰，明白，有系統，並有平和而堅定的見解。英國記者施諾 *Shaw* 入陝北，就是他給毛澤東作譯譯。他是一位漂亮的宣傳家。

隨後廖承志來了，這是廖仲愷先生的哲嗣，何香凝先生的痛愛者，他會好幾種外國文字，會畫，會唱，會寫，會交際，而且會吃苦，這是紅軍中多才多藝的人物。紅色中華日報現改為新中華日報的就是他主編。

劉伯誠一會來了，身體看來很瘦，血色也不好，四川人有這樣高的個子，要算「高」等人物。他之有名，不在到了紅軍以後，西南一帶，對「劉瞎子」的威風，很少人不知道的。他作戰打壞一隻眼，身上受過九次槍傷，流血過多，所以看起來外表不很健康，然而他的精神很好，大度河也是他打先鋒。行軍時，飛機炸彈還光顧了他一次，幸而不利害。他在莫斯科曾經令佛洛西諾夫敬佩過的。「紅軍總參謀長」是每個紅色戰鬥員都知道利害的。



天已黃昏了，屋內地上燃着火，再進來一位老者和中年澆子模樣的人，前者是林祖涵先生，後者是朱德先生。林先生真是老而益壯，朱德已有五十多歲了，而面目僅如四十歲人之健壯。他說每天打籃球，說話完全四川音。『半生軍閥，半生紅軍，』他自己笑着自道。他說紅軍作戰沒有什麼祕訣，只是政治認識透到每個戰士，和羣衆基礎工作得到許多便利。

悄然出現的是丁玲女士，我們是初見，而不想到見面在這樣地方。她打算在陝北搜集些材料寫東西，將來當有些特別的東西出現。

現任中共總書記張聞天先生（洛甫）戴着不深的近視眼鏡，出現於人羣中，他的談風輕鬆精利，不似會過萬重山者。

最後到的毛澤東先生，許多人想像他不知是如何的怪傑，誰知他是書生一表，儒雅溫和，走路像諸葛亮『山人』的派頭，而談吐之持重與音調，又類三家村學究，面目上沒有持別『毛』的地方，只是頭髮稍爲長一點。

同毛澤東先生進屋的，還有一位年近古稀的徐特立先生，他公然從江西走到陝北，這是了不得的事件。

圍爐坐着一大圈，談話的火線，打得很緊，以後中國的政爭，最好也用這種方式，大家不耍動武，免得老百姓遭殃。關於和平統一後之黨和軍隊問題，那時他們的意見還是主張維持原有的組織和系

統。

那晚的謔會，也有海參之類，大概是招待「布爾喬亞」的，他們平時吃這些東西，恐怕太不易找到了。謔會中，只有張國燾先生沒有來，說是病了。飯後，我特去看他，因為我次晨要走，不看他一次，覺得很抱歉。他現在是紅軍總政治委員。我們去時，他果然已經睡了，他立刻起身，咳嗽很兇，他的風格帶嚴肅性，深沉性，這是另一作風。

然後赴毛澤東窯洞作竟夜之談。到時已夜十時。

他那個窯洞內除了一個大炕之外，還有一張木椅，一張桌子，一條木凳，一盆木炭。木桌上放了許多紙條，還有經濟學和哲學書籍，桌上燃起油燭。他對於窯洞發生了感情，因為牠冬暖夏涼適宜居住。他說薛仁貴回窯的，是這種窯。不是南方的磚窯。他因為過去行軍作戰關係，作計劃下命令，都是夜間，於是白天在臥式轎裏睡覺，夜間才緊張的作事，弄成和我們新聞編輯一樣的日夜顛倒。他用腦過度，腦血管膨脹，經常興奮，神經受點影響不容易睡着。如果在行軍時身體有勞動機會，睡覺可以好些。他平常很愛讀書，外間輿論的趨勢，他很清楚的和我談論。

他最喜歡談戰略，他在紅大教戰略一科。說到戰略問題，精神特別好了起來。他說五次圍剿中他們失敗在不應當廣昌大決戰，不應和陳誠先生指揮的主力硬拚，應當暫時放棄蘇區分紅軍為四路，猛出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四點，施以佯攻，以誘動江西兵力，然後擇弱點一戰，勝而後回江西，再突破弱

的方面，則蘇區可以保全，不得已放棄江西之後，最初的目的地是湘西，並不敢預定說能到遙遠的西北來，先命蕭克去探路，只想從湘西憑藉賀龍偷渡長江的技術，從三峽區域，北過長江再圖發展，誰知追隊太緊，湘西不能立足，乃想圖貴州，貴州四面受敵，而且太窮，乃轉而想從四川西南轉入川西北之松潘一帶暫駐以觀形勢。土城一敗，逼得走雲南川邊。辛辛苦苦到了川西北，乃是蠻荒千里，不宜居人，且松潘要地已入胡宗南手，不得已始出甘肅到陝北。他們入山西是政治的目的，不是軍事目的，中央軍那時如果不自東壓迫，他們將割汾河流域沃野，一面補充自己，一面激動全國對外空氣。徐海東之由陝南經隴東入陝北，乃偶然作成中央紅軍之嚮導，並非如蕭克之有預定計劃。至於紅軍大會台於會甯靜甯海原一帶之時，進攻目的在甯夏，西連甘肅涼州，確立西北根據地，徐向前過黃河，義卽在此，「雙十二」以後，政治形勢變動，這些都用不着了。

他以爲共產黨的要求，希望中國走上憲政民主之路，以民主求統一求和平，和平統一之後，始可以言抗日。故爲實現民主政治，共產黨當可放棄土地革命，蘇維埃和紅軍的名義。中國將來當然會成爲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但是共產黨不放棄工農生活之改善運動。這當然是共產黨愛國主義的新轉變。有人反對共產黨談愛國主義，他以爲是不澈底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列主義是反帝國主義的，在半殖民地的國家提倡愛國主義，本質上就是反帝國主義的。他們停止階級鬥爭的原因是因爲半殖民地的中國，外在矛盾，大過內在矛盾，所以縮小內在矛盾，先解決外在矛盾。

天將明了。我回去紅大休息一會，即登車南返。（長江）

## 共黨與西北

共產運動在中國，特別在今天，已經走上一個空前的歷史階段。在西北方面，現在展開的嚴重情勢，在我個人看來，是許多年來中國未有的複雜局面。中國整個未來的命運，也許要看這個局面的開展如何。這是事實，不是誇張，在這裏共產黨提出的要求：有停止一切內戰，恢復一九二五——二七的國共合作，成立代議的民主政府，以及立即對日宣戰。這裏有東北軍，也有西北軍，他們在事實和表面上都同共產黨的主張一致，紅軍爲什麼採取這個新策略呢？這種策略真是一個新的政策嗎？

爲了解現在的情勢，我覺得我們有溫習最近歷史上幾種事實的必要，這幾種事實，充分的影響了中國的共產運動。在這裏我不願意消費許多的時間，來搬出國民黨所作的史料。因爲那是諸位早就熟悉的，我現在要根據在赤區所聽到的，來解釋一下：

我們都知道：中國共產黨是一九二〇年創始的，到一九二三年孫中山先生和蘇俄使者越飛（Григ）會見以後，更得到迅速的發展，不久以後，即有國民黨的改組，與共產黨成立同盟，實行合作，共同發動一九二五——二七的國民革命運動。

這一次合作的基礎，是由於孫中山先生和國民黨接受兩大原則：第一在對外政策上必須持定

反帝國主義政策，那就是用革命行動恢復中國整個的政治、經濟、領土、主權的完整。第二：對內政策上，是反封建主義，那就是實現民主的革命，打倒軍閥地主，而建設新的社會經濟生活，這是國民黨與共產黨所共認的資產階級性的民主制度，他們也共同認定，這種革命的目的，可以在民主代議的共和制度下順利的完成。自然，在共產黨方面，認為資產階級性的民主制度，是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必經的序幕。社會主義社會遲早是會到臨的，所以，他們對這種前進運動的擁護是完全合乎邏輯。

大家都知道，國共的合作，到一九二七年結束了。在共產黨的眼光看來，原來所謂國民革命也就在此告終，國民黨右派在新軍閥的統治之下，破壞了合法選舉的武漢政府，而在南京另組政府。在那個時候，大部國民黨和共產黨，都認為那是一種背叛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反革命行動。

國民黨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後，共產主義者即變成須處死刑的罪犯，而共產黨組織，也就被逐入地下了。從此以後，共產黨所期望的反帝反封建兩大民族主義原則也完全放棄，同時鎮壓革命的大規模的內戰，也就開始了。成千累萬的共產黨慘遭屠殺，許多農工協會的領袖都處死刑，而農工協會組織的本身也完全破壞。民主政治沒有建設成功，軍閥的獨裁却樹立起來，這樣各種各式的對內戰爭無期的展開了。但是，在軍隊裏仍潛伏着許多共產黨。經過了一個時期的恐怖，共產黨的本身，集中起來！

一九二七年八月國民黨軍隊第一次叛變，在南昌爆發，這次暴動的事實，非常有趣。領導暴動的

人是共產黨和黃埔軍官畢業蔣介石的學生，但他們仍然持着青天白日旗，標榜三民主義，反對南京政府，背叛國民黨的革命主義。繼南昌事件而起的有汕頭，廣州以至於各地的暴動。以後這些主持暴動的隊伍，慢慢的集中到江西和湖南的山間，他們的領袖，大部是黃浦的軍官，激烈的學生，以及各地的勞工和農民。在這個時代，共產黨祇有被消滅或鬥爭的兩個途徑，他們選擇了鬥爭的途徑，一九二八年他們正式宣佈國民黨為無望的反革命的集團，並在江西和湖南挑起他們自己的紅旗，為保衛農工民主革命的前驅，他們認為他們是保持原來的革命主義和三民主義的精髓。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赤色政府成立的時候，他們本身並未自稱為社會主義的國家，而稱為資產階級性民主政治農工蘇維埃政府。蘇維埃在俄文中的唯一意義，是議會，僅是代議制度的一種形式，而這種制度無論社會主義社會或資產階級社會都可以採用。遠在一九〇五年時，蘇維埃制在俄國已被實行，此後在資產階級的克倫斯基時代，尤常被用為民衆代表的組織形式。

一九二八到一九三〇年間，紅軍的發展非常迅速，起初僅有幾十支步槍，可是因為陸續參加新的份子，很快的在湘贛兩省發展到數千農工的軍隊，他們繳除了許多國民黨軍隊的槍枝和子彈來武裝自己。這樣迅速的發展，激起國民黨在一九三〇年間始首次大圍剿。以後，在「肅清赤匪」的旗幟下，開始了延續不斷的進剿計劃。

第一二三四次的圍剿計劃，可謂完全失敗。在這幾次圍剿之中，紅軍粉碎了許多師團的國民黨

軍隊。這些次圍剿，事實上充分的供給了紅軍以武器和軍火，同時還擴大了他們佔領的地盤。所以紅軍戲稱「白軍」爲「軍火的運送隊」，當我在赤區的期間，他們給我許多像片，上面照着他們從國民黨軍隊奪的大批旗幟，子彈槍枝，以及其他軍需用品，並貼着「共產黨青年的禮物」等字樣，毛澤東親自告訴我，在南方歷次圍剿中被他們繳械的國民黨軍隊總數在三十萬衆。

直到第五次圍剿，也就是國民黨對紅軍進攻的第七年，「殲滅」的計劃才微奏功效。在一九三四年初開始五次圍剿，那時全中國蘇維埃會議，剛在赤都瑞金開過，到會的有在蘇維埃統治下生活九百萬民衆的代表，事實上當時蘇維埃中央政府已經統治了江西的大部及福建湖南二省的一部。此外還有其他的蘇區，與江西蘇區在地理上沒有有機的聯合，這些蘇區散佈在河南，安徽，湖南，廣東，四川等地。

在第五次圍剿中，蔣介石動員了九十萬大軍，其中有四十萬參加積極進攻。他採用一種新的戰略，充分的利用大量的資財，優越的富源，精銳的武器，以及機械的戰術。又命大部的南京軍隊把整個赤匪包圍起來，各守固定的防區，對蘇區實行嚴厲的經濟封鎖。

這次圍剿消耗最大，蔣介石建築了幾千里的軍用公路，數千座小砲壘型的碉堡，在上面配合着機關槍。蔣氏這種攻守的計劃與戰術，使紅軍的活動受了極大的限制，因爲他們缺少資源及器械，少數的軍隊利於作遊擊戰而不利於作陣地戰。所以這第五次圍剿不啻使蔣介石建立了一條人築的

長城，包圍了蘇區的四周，並逐漸向內推進，他們的意思，是想把紅軍推到潰滅無路的境地，同時在審慎的計劃中，決不輕易使他的軍隊，離開軍用公路及碉堡，祇有在礮兵，裝甲車，坦克車，重轟炸機，及毒氣（祇用這一次）的掩護下才開始前進，可是在這樣環境下，使紅軍失去機會和他們的敵人作誘敵，伏兵，奇襲或遊擊戰術，他們不能接近利於佔有大量資源的敵方。

第五次圍剿的大部據說是由蔣介石德籍顧問所計劃的，而其成就如何，實多歸功於前國社黨參謀總長塞克特將軍（General Von Seeckt），塞氏曾任蔣氏的最高顧問。

蔣氏的新戰術與新策略，雖然相當的澈底，不過仍是十分的遲鈍，除勞民傷財之外，並未發生甚大效果，所以五次圍剿，雖然延續了幾日，而對紅軍的主力，並未與以致命的打擊，不過，因為嚴密的封鎖結果，使地面狹小的赤區，對於國民黨軍嚴重的壓迫，無力支持，在這種情形之下，南京以為殲滅紅軍的企圖可以成功了，以為無論如何，被重重包圍的紅軍是無法逃過了，成千累萬無辜的農民，每天在飛機轟炸機關槍掃射之下，無情的犧牲了，甚至許多紅軍也被殲滅了，但是，農民的犧牲是超越紅軍的，這種情形根據我個人在西北的觀察下是相當確實的，據上海著名銀行家章乃器先生在大衆生活上的一篇論文中統計，第五次圍剿中一切間接的財產損壞，失業，城鎮破壞加上維持軍隊的消耗，南京政府殺掉一個紅軍，需要八萬元之數。

不過在事實上，五次圍剿的目的完全失敗了，它原來的目的是在根本肅清紅軍的主力，而紅軍



在瑞金召開軍事會議，通過在戰略上退却的決議，把紅軍的主力移置到另一個根據地。這種偉大的長征計劃，在一年以內，完全的達到了。在這次長征的行動中，他們表現了比在過去取攻勢時期還大的軍事天才，在統一號令之下，他們造成了歷史空前的西北長征。

紅軍的主要實力在九萬人以上，他們退出江西的神速、敏捷、嚴密，直到他們已經退走幾天以後，敵人的最高司令部才發現紅軍退走的事實。他們首先把一切正式的紅軍從前線撤回，集中到江西的南部，而用遊擊隊填防，這些活動，完全是在夜間執行的。等到全軍集中在瑞金以後，才宣佈遠征的命令。在三夜之間，他們加速的西進：在第四天他們全部出人不自覺的衝破湖南廣東方面的防禦線。他們向這線上的堡壘各個猛攻，使他們的敵人手足無措的疲於奔命。他們繼續猛擊下去，直到把全線上的堡壘壕溝全部佔領了才休止。這才打通了一條往西往南的血路。

衝破了防禦線之後，他們便進入湖南，這一萬里長征「便由此開始，這一段的故事太偉大了。紅軍方面對這長征，有一部綜合的紀述，是集合若干人的記載而成的，全書不下三十萬言，但離完成還遠呢。我現在能告訴你們的是：他們在敵人的軍隊追逐、壓迫、空襲之下，平均每日一戰，紅軍到底穿出了湖南、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四川、西康、青海、甘肅而於一九三五年十月紅軍第一軍的前鋒到了陝北了。在那裏他們和紅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十七軍取得聯絡，因為那裏早在一九三三年便成立了蘇維埃區了。

這長征，最初的起點是福建，紆迴曲折的據說有二萬五千里，約合八千英里。無論如何誰也不能否認這長征是在軍事歷史上成就了一個奇蹟。當年漢尼拔率軍橫越阿爾卑士山，與這個長征比較起來，也不過如同星期日的旅行罷了。祇有拿破崙兵敗莫斯科退軍回法的長途，差堪比擬吧。

紅軍的向西北進行，無疑地是一種軍事上的撤退策略，絕對不是一種潰退，而且直到最後達到目的。他們的中心幹部仍然完整，他們的意識和政治信念依舊堅強。紅軍們自己宣稱而且相信，他們是向着抗日的陣地前進了。他們這種信念，在心理上是很關重要的。因為這麼一來，可以使他們很容易從淪為沮喪的潰退一變而為勝利的前進。歷史告訴他們這種遷移是對的：因為西北的確是一個抗日的軍事根據地。他們很清楚的看出這個決定未來中日蘇三國命運的地帶。

這種技巧的領導，可以說是一種偉大的政治策略。驚險的長征，得以成功，殊非偶然。在這長征裏，他們經過了世界上最高的山嶺，渡過了中國最深的河流；深入蠻荒。當他們路過西藏的大草地時，五日不見人烟，粒米滴水不會入口呢！

關於紅軍的長征已經說了很多，現在紅軍已到西北了，讓我來把我自己的紅軍訪問報告諸位。我們去年七月的上旬到了陝西的保安，在紅區逗留一直到去年的十月。保安是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都會。蘇維埃區包括陝西的北部，甘肅的東部（清水河以東），西蘭公路的北部，寧夏的東南角（黃河以東以及長城以內的部分）。

我在保安住了一個月左右，在路上有四十天以上，其餘的時間，使用在訪問蘇維埃各種組織及甘肅寧夏的紅軍前線上。那方的紅軍領袖，我差不多都遇見了。我和紅軍的士兵一起旅行，我住過鄉下人的草屋，我住過醫院，同時也住過紅軍在保安的外交部。我和若干農民，工人，士兵以及兒童談過話。兒童大一點的被組成先鋒隊，年紀小的則屬於兒童團。

在這期間我得到許多新的見聞，和新的智識——多到直至現在我還沒有時間來領略它。所以我所能告訴你們的祇有是竭力把我的印象歸納起來，分成四個部分：第一，蘇維埃區的政治與社會組織；第二，蘇維埃區的經濟狀況；第三，紅軍的性質；最末是蘇維埃政府的政策。而我所能告訴你們的祇是一個概括，正如孔子所說「舉一隅可以三隅反」一樣，其餘請大家自己去判斷揣測吧。我爲什麼把社會和政治的組織歸納到一起呢？因爲這兩樣在赤區是差不多分不開的。

例如，我先告訴你我自己一個經驗，當我初入蘇區時，首先經過一個整天見不着人烟的地方，身邊祇有一個騾夫陪伴着。這些邊界常常受地主們豢養的民團所騷擾，他們不斷的侵入蘇區裏掠奪放火，以及擄人。他們簡直是些匪賊罷了。有些民團很顯明的在追逐我。有一次他們祇有幾里路便追上我了，不過因爲我所旅行的是些山路，看不見後面的人影，所以不知道。有一個村童，也就是紅軍的先鋒隊，看見這情形，便急速地抄着一條山上的捷徑，去警報紅軍的前哨，說是一個帝國主義者領着一百名賊匪，侵入蘇區來了。紅軍立刻派下了伏兵，結果把民團趕走了。那天晚上我到了安塞，纔知道

此事，紅軍的軍官告訴我脫險的經過。幸而他們不相信這些民團是我領來的。

這個少年先鋒隊的忠實行動，就是蘇區政治與社會責任相關的具體表現，他們的忠實與負責，正與中國其他鄉人的不管閒事相反。

當你旅行蘇區時，你常常會被一些農人或婦女阻住，問你要一張路條來看看。有些農夫會和你談些淺顯的政治問題，最少他們也能和你談一些他們區內的政治。在一般鄉村裏，至少有一兩個人了解中國的政治現狀，而且知道日本帝國主義的歷史，和蘇俄一些事情，對英美兩國也有相當認識，甚而可以來和你討論法西斯蒂與共產主義，例如當我旅行蘇區的時候，中國正鬧着西南叛變，國際間正鬧着西班牙內戰，好些農夫便把這兩個事件提出來問我。雖然住在深山的村落中，但他們很知道一些關於國內與國際間的事，他們也許是從村民集會中聽得來的，也許是從他們的蘇維埃報紙看見的，也許是從他們的蘇維埃廣播無線電聽來的。我記得曾遇見一個山中的居民，也很注意阿比西尼亞事件，他向我發了幾個問題，使我至少知道他對這問題是有相當研究的。自然這些人都是例外的，平均一些鄉民祇知道他們當地的村政罷了。

談到政治，蘇區裏一切組織都根據蘇維埃制度。從村落到中央，都各有一個人民代表的政府，他們的機構是：鄉蘇維埃，區蘇維埃，縣蘇維埃，省蘇維埃，乃至於中央蘇維埃，每村選出若干代表為村代表，村代表選區代表，遞嬗而至蘇維埃大會。

區蘇維埃以下，成立若干委員會。其中最具權威的是人民革命委員會，是由一個公開的民衆大會推選出來的。區蘇維埃以下的委員會，大致分教育、娛樂、擴軍、軍訓、合作、政訓、土地、衛生、遊擊隊訓練、革命保衛及其他等委員會。這樣組織，下自區蘇維埃上迄中央蘇維埃都是一樣，不過中央蘇維埃是個取決國策的最高機關罷了。

可是組織並不止於政府本身。共產黨在城市與鄉村的農工之中佔有多數的黨員。此外還有共產主義青年團，其下更附屬兩種組織，即先鋒隊和兒童團。共產黨把婦女也同樣組織成青年共產主義者同盟，抗日會，看護學校等。成人的農夫便組成貧民會，抗日會，甚至從前的祕密會社，如哥老會等，也被吸收到蘇維埃的組織裏。他們在赤區內公開而且被認爲是合法，可以參加各種活動。農民會和遊擊隊也是政治社會機構中一種嚴密的組織。

這些組織與各種委員會的工作和蘇維埃政府、共產黨、紅軍等都是相輔而行的。至於他們在組織上的關聯，實非在這樣簡單的談話中所能盡，總之，可以概括地說，他們的組織非常廣泛，使每個成人婦女以及小孩都能參加一種組織，負擔着一定的工作，這種制度的好處，是他們的工作不是用政府或軍隊的力量強迫去做，而是由人民組織裏的公衆力量敦促成每人成爲一個志願服務社會者。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一切活動都成爲人民與政府工作人員的合作事業。而民衆中一切的力量，聰明、愛國心、經濟的潛伏力都能充分的利用與發揮。

可是一些農民到底作何感想呢？中國的農民是被認為反對組織，反對訓練的，尤其是對於他們家庭以外的社會活動。我所能回答的是：據我所會談的農民，都似乎偏袒蘇維埃與紅軍。自然，他們對一個洋鬼子的答話，多少會有些遲疑。不過許多鄉人還不知道我是個洋鬼子，因為蘇區裏，中國的各省人都有從廣東去的，有從東北去的，方言是那麼多，外觀是那麼複雜，許多土著還認我是個中國人呢。

在各種環境下我單獨和一些工人或士兵談過話。他們都可以自由地批評政府，但當我問他不是愛蘇維埃甚於國民黨，他們的答語差不多都是毫不遲疑的說聲是，我更注意到一件事，許多鄉民談到蘇維埃都說「我們的政府。」這使我認為是中國的一件新奇的事。縱然他們對於某一種事件，感覺到抱怨，但他們都似乎對紅軍懷好感。

還有一件有興趣的事實，值得提出表明紅軍確有它的羣衆基礎。從前的蘇區都是由一些農民自己去警衛，蘇區裏沒有固定的守備兵，所以他們戰鬥力可以全用在前線上。地方的警衛完全操於村民及革命保衛團，農民自衛團以及遊擊隊之手。例如陝北的前線，完全由這些農民組織來防衛。這種事實可以表示人民對於紅軍的愛戴。因為紅軍並不是寄生在他們中間，作一種剝削與壓迫他們的工具，而是長期的在前線上，鞏固新得區域以及和進攻的敵人作戰。在另一方面說，這種嚴密的農民組織變成一種後方保衛隊，使紅軍高枕無憂地極力出動。這功效是顯著的。

言論的批評，是不加禁阻的。在蘇區裏你可以看見許多壁報上的短文或小故事，是從事批評或指責的。值得讚美的文字可以得獎賞。

要理解農民所以援助共產黨運動的基本原因，須先考察蘇區的經濟狀況。在我未討論這問題之前，我最好先給你們介紹一下，紅軍未佔領前的西北狀況一個概念。

我現在先引用施登泊博士（Dr. Zampfer）所作題名『西北各省與其發展的可能性』的報告。施博士是國際聯盟會的專員，

施博士提及西北幾年前的大飢荒，說是陝西的某縣經調查死去百分之六十二，另一縣甚至死去百分之七十三。他更指出據正式估計，甘肅一省餓死的人口有二百萬人，我現在隨便引施博士的報告，來表示在國民黨治下的西北各處狀況。

『一九三〇年大災荒時，二十畝地可以用三日的糧食換來。資產階級便利用這時機，大量增加他們的地產，而自耕農的數目便逐漸減少了。許多田地，淪為荒野，許多土地，流入地主與官僚手中。尤其是甘肅更多可種植而不種植的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〇的荒年，甘肅的地主們用極賤的價目收買許多土地。從那時起他們大發其財。

『在陝西不納地稅被認為是光榮的表徵，所以闔地主慣例是免稅的。

『在陝西更有一件令農民感覺不滿的事，就是催繳歷年欠納捐稅，可是在荒年的時候，他們都

棄地逃荒去了，地都沒有耕，那有捐稅可納。但官方不肯放過他們，不納足欠捐，不准他們恢復舊有地產。

國民黨治下的甘肅，施博士也說：

「甘肅在過去五年中，平均每年歲收超過八百萬元。這課稅數目比浙江省還重，而浙江本來是中國課稅最多，人民最富的省份之一，他們所納的數目實際比公佈的還多，第一因為稅吏要扣得一部提成，或有時候要扣一大部分，第二，因為除了省縣政府稽徵的捐稅以外，還要加上駐軍長官所課的稅，這在甘肅根據官方估計在一千萬元以上。此外人民還要供給當地民團的餉，這些民團有時候還會變成流寇，要附近的鄉村來供養。」

關於這一層我不能扯的太遠了，但還有一件值得提供參考的就是寧夏省政府官報裏，載着一張寧夏省在馬鴻逵治下時替國民黨所徵收一切捐稅的表，它列舉有「交易稅，家畜稅，駱駝稅，鹽運稅，食鹽稅，鴉片煙燈稅，羊羣稅，商人稅，攤販稅，地產中人稅，普通食品稅，特別食品稅，額外地畝稅，屠宰稅，婚嫁稅，食油稅，石磨稅，木料稅，及菜蔬稅等。」稅的名目，自然不止於此，但這已經足夠表示出來當地的人民對於國民黨不會有什麼好感了。

共黨在他們的蘇區裏把那些佃戶，貧農，以及中農的環境澈底的改造了。就是在一個新得的區域裏第一年全數豁免各種捐稅，並且保證以後對土地和商業祇徵收一種簡單的輕微的累進稅，其



次便是把一些土地分給那些渴望耕種的鄉民，同時墾殖許多荒地。這不能不使我們注意到蘇維埃的土地政策了。重分土地是共黨的基本政策。那麼，怎樣去沒收土地呢？

共黨把鄉村的居民分成這麼幾個範疇：（一）大地主（二）中小地主（三）富農（四）中農（五）貧農（六）佃農（七）農業工人（八）產業工人（九）流氓無產階級（十）自由職業界及智識份子。

西北蘇區的土地法（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公佈的）規定沒收所有大地主的土地及富農自己不耕種的土地。但仍發回他們自己所能耕種的數量。在那些土地並不缺乏的縣分（西北這樣的縣分很多）那些地主與富農的土地，可免沒收，但是荒地與主人不在的土地是要被分配的，有時也許把較肥沃的土地重新分配，使貧農分得一些較好的地，而富農便攤得一些較壞的。

地主是什麼呢？照蘇維埃的定義簡單說來：凡是一個農民他的大部分收入不是出自他自己的勞動而是靠着把土地租給別人的都是地主。由這種定義的解釋，那些放高利貸的人也併在地主的範疇裏，受同等的待遇。照施登泊博士說，在西北放高利貸的利率從前高到百分之六十，甚至當緊急的時候，利率還會更高些。他說許多農夫借了高利貸已經還過兩三倍原借的數目，而依然欠着比借來的還多。這樣情形屢見不鮮。雖然地價在陝西和甘肅許多地方是那麼便宜，但一個沒有本錢的農夫想積累錢來購買一塊田地實際是不可能。我記得我曾經和一個從前甘肅的佃農談過話，他移居到

山裏有十五年了，可是未能積蓄一注本錢來購買一小片農場，雖然那裏地價祇有兩塊錢一畝。

除了上述地主階級以外，其他階級的土地是不在沒收之列的。赤貧的農人，佃戶及農業工人，都給與足用的土地來供給他們的生活。須知蘇維埃這種土地政策，不是平均地權，蘇維埃現行土地法的目的，是使人人都有相當土地來保障他及其家庭的充足生活，這也許就是農人們的迫切要求啊！

這土地沒收和分配問題，因為西北的大部分土地，過去是在官吏們，稅吏們及逃亡的地主們手中，所以很容易解決了。他們用不着和那些富農或地主爭執，便可以把土地沒收過來，分別給與那些貧農來滿足他們的希望，因此之故，蘇維埃不特在貧農及無產階級裏樹立了經濟基礎，而且因為豁免捐稅，也博得中農階級的相當同情，甚而有些小地主也對他們抗日運動予以相當援助。陝西許多著名的共產黨員是從地主階級來的。

此外對於貧農還給與格外的援助，就是用最低利率或者無利的將款項貸與他們，高利盤剝制度當然取消了。去年在陝西就有大量的棉麥種子照成本分配與農民們。紅軍兵工廠裏還製造幾千部農具，給予沒有土地的農民去開墾荒地。初級的農林學校已經在保安成立了。他們還告訴我，一所畜牧學校也在籌備中，祇要從上海聘請的專家一到，便可以開辦。

陝西甘肅甯夏的北部，從前的時候，文化上和經濟上在中國算是最落後的。那裏不曾有過機器工業，而其黨居然破天荒在那裏成立幾家報館，吳起鎮工廠裏有一位工程師，是留學回來的，甯願捨

棄了在上海一年賺一萬元的職業來到紅區裏作沒有報酬的工作，他管理的那部炭燃機在那裏是一件新奇的事，簡直沒有一個農民看見過這種機器。

共黨的工業，原來是極幼稚的。它們包括製紙，製革，棉花和羊毛紡織，被服，兵工等工廠。其中許多簡單的機器是從江西帶來的。有些是去年從山西「俘虜」來的，更有些是私運來的。共黨開發了延長的石油井，而且設法增加產量，超過了從來的紀錄，他們能作很好臘燭給消費合作社來出售。

陝甘甯的紅區裏都成立了合作社。他們告訴我紅軍在江西的時候，有一萬多家合作社，農民社員有五十萬以上。與國——紅軍在江西時的模範縣——有一條二里長的街道，完全為消費合作社所佔，出賣各種貨物，一天作不少的生意。在陝甘甯蘇區裏也有四百家合作社。以上的消費都是蘇維埃財政委員長林伯渠告訴我的。林想不到是一個極有趣的老年人。他和孫中山組織過同盟會，後來又是國民黨的創辦者，一九二六年作過中央委員，任過國民黨的財政部長，他的元老資格比蔣介石還高，一九二七年國共分家的時候，便加入共黨裏。

林伯渠從江西隨軍出發，步行七千英里，白髮飄飄，笑容滿面的活像一個聖誕老人，與那充溢着青春的紅區恰成一個鮮明的對照。他在國民黨裏有那麼高的地位，以已過半百的年紀，毅然捨去了親戚，朋友，家庭，產業而加入十字軍長征——他們相信紅軍這樣領導着他們，林伯渠是一個在兩個極端相反的社會裏仍然列居高位的少數人物。因為他在封建制度，君主制度的滿人治下及共產主

義的中國蘇維埃政府裏，都當過大官。像他一樣的，還有一個謝覺哉，陝西省蘇維埃政府的祕書長，他在滿清時代是一個秀才而且作過知縣。

對不住得很，因為時間短促的原故，我不能再多細說蘇區的經濟組織了。我現在把題目移轉到紅軍的本身問題吧，我相信這是最有興趣的。我們要記得所有紅區裏的社會、政治、經濟等組織都是暫時的。就是在江西的時候也不過如此，因為蘇維埃從創始以來，無日不在戰爭中圖生存。我們不能把今日的紅區認為是已完成的改造社會的試驗，實在祇能視為一種未完成的革命，而為紅軍將革命勢力擴大的一個根據地。

現在的紅軍，不特佔有空前的廣闊的相連區域，而他們的數目也許是除了在江西紅軍勢力達最高峯的時期之外，比任何時期為多。朱德賀龍徐向前張國燾領着他們的隊伍在南京軍隊圍攻之下，衝出了四川西康，于十月初旬在甘肅取得各主力軍的大會合，而擴大了西北的根據地。

紅軍經過了從新改編之後，現在分成三個軍團，叫做第一二四抗日紅軍。除了這些基本隊伍之外，在陝西還有東西集團軍，數千百的遊擊隊，赤衛軍和農民自衛軍。

估計這三方面軍隊總數約在九萬至十萬人之間。這些軍隊大多數都有新式步槍的配備。他們也有自動步槍輕重機關槍及輕砲，所有這些軍器都是從敵軍手中得來的。紅軍還有兩師騎兵，所騎的差不多都是從馬鴻逵手中奪來的甯夏馬。這些騎兵都是很好的騎手，也是中國唯一佩馬刀的騎

兵甯夏和綏遠還有回族紅軍和蒙人遊擊隊。

這就是所謂『殘餘共匪』。蔣介石將軍在去年雙十二西安政變時正欲剿清的，那是第六次圍剿了。

我可以告訴你一些紅軍的事，在我看來是極有興味而且值得注意的。這些事實是我會見紅軍第一方面紅軍政治部主任楊果泉——一個二十九歲的青年——所聽得來的。

我要先說的：許多人都以為紅軍是困苦的土匪及流寇。在我看來，這觀念是錯誤的。紅軍的主力多半是一些年青的農工，他們自信是為家，為國，為土地而戰——大體來說，這是事實。他們隊伍的平均年齡是十九歲。我自己的印象是：他們在知識上，體格上的確稱得起一隊少年軍。他們深深瞭解他們的使命與任務。他們都是極端愛國者。倘若你問他為甚麼加入紅軍，他們通常的回答是：第一因為我們要和日本帝國主義戰爭，第二，我們怨恨地主們和高利貸者。

彭德懷所統轄的第一方面軍裏，有百分之廿五是農業勞動者（包括手工業者，騾夫，學徒，學業工人等）；百分之十三是產業工人；百分之五十八是農民；百分之四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以及小地主，富農等等。在這一軍裏，士兵和軍官合起來，有百分之五十是共產黨黨員或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

大約百分之七十三的士兵能寫讀簡單的文字，標語及傳單等等。（地方的軍隊識字比例略微

低些）他們的識字程度比陝西的農民——百分之九十五是文盲——高得多了。紅軍是從入伍那天起便要開始辦認那特編課本的字，他們每天還要聽些政治講演。

士兵也和軍官一樣，是沒有薪餉的，祇是每人在他分得的土地裏取得一些收入，飲食，服裝，氈毯，以及其他應用物件，完全由軍隊供給，士兵個人永遠不許沒收他人物品，如果盜竊他人物品，要受嚴厲的制裁。士兵購買物件必須償價，而且絕對不許欺壓小商人及販夫。在蘇區裏祇有蘇維埃政府檔案處，兵工廠及儲械庫是謝絕參觀。我會和許多農民士兵接觸，住過好些生疏的地方，但我不會丟失過一件物品。

紅軍士兵按着省份來說，百分之五十四是陝甘晉人，百分之十四是河南人，百分之十三是安徽人，百分之九是湖北人，百分之二是江西人，百分之五是東北人（東北軍的舊部。）在另一方面軍裏，大部份是南方人。其中還有苗人，獯獯及回人的兵士和小隊長。第二及第四方面軍裏，雜有西藏人及蒙古人。

紅軍軍官的平均年齡是二十四歲，包括由分隊長以至軍長的年齡都在內。營長以上的幹部都是黨員。祇有一兩個例外。

連排長以上都是識字的，雖然我遇見過許多入伍以前還未學讀書識字的。團長以上的軍官，雖然年紀是那麼輕，可是平均起來，都有過八年的作戰經驗。在紅軍的將官及

蘇維埃的幹部裏，有黃埔軍校的畢業生，有大學中學的畢業生，有從前國民黨的官吏，有東北軍的軍官，更有許多從英、法、德、俄回來的留學生，但我所遇見留美的祇有一個。

紅軍大多數的士兵和軍官的未婚或「離婚」的——就是他們把妻子和家庭撇下。幾個例子中，我很懷疑他們的所以加入紅軍與他們想解脫婚姻，不無牽連。紅軍的士兵不叫作「兵」，而稱之曰「戰士」。我的印象是半數以上的紅軍戰士還是童男。女共產黨是很少在前線上和軍隊在一起的。據我的見聞，紅軍對於農民的婦女都非常尊重，農民對他們的紀律也很稱道。紅軍很少吸煙喝酒的。第一方面軍軍長彭德懷——他原是國民黨軍隊裏的將官——告訴我少年的紅軍，最大的長處是刻苦耐勞，這也是他們不急劇就要異姓伴侶原因之一。彭氏本人從一九二八年領着一部國民黨的軍隊加入紅軍以後，就沒有見過他的夫人。

紅軍軍官的死傷率是很高的。他們自團長以下常常和士兵在一起作戰。在第一二次國民黨大圍剿的時候，紅軍軍官的死傷率達到百分之五十，可是軍隊怎麼能忍受這種重大犧牲！所以從那次以後，他們採取一種戰略來減低有經驗軍官的生命的危險。但是國民黨第五次——他就是江西末次——的圍剿，他們的死亡率還到百分之二十五。在現在的蘇區裏，你可以看見許多事實上的證明，很多二十幾歲的青年，失掉手或割去了手指，面部創傷或四肢不全，但他們還在為革命而戰爭。

紅軍自然有一個規定的時間表來作體育、智育、社會及政治知識的訓練。他們鼓勵跳高、跳遠、攀

牆，賽跑等比賽。每天認兩點鐘的字是強迫的，由連長排長領導着在本連排的俱樂部上課，每天還有射擊，騎馬，戰術，刺刀，以及步伐等操練。在娛樂的時間他們便唱歌，寫壁報，研究各種學術等。

實在紅軍的生活並不算壞啊！在我看來，他們大部時間是消耗在歌詠上。他們自己製出千千百百的新歌，而且繼續撰作。如果你走近他們的營地，聽吧，一陣陣入耳的歌聲，是他們在上音樂課。歌詠也有比賽的，還給善歌者預備獎品。信不信由你，他都唱得很好，尤其在夜間，歌聲震蕩着你的心弦。而遊擊隊的集團合唱，更能使你感動。一個在吳起鎮的嚴正的工程師告訴我，他認為「紅軍消耗在歌詠的時間太多了。」

實在我所遇見的紅軍，要算是在中國裏最快樂的貧民。他們的生活自然的困苦的！平常而簡單的食品，襤褸的衣裳，而艱難困苦還是不斷的來臨。但是人人的生活，都是如此，上至朱德，彭德懷，下至行列的弟兄，在士氣上一些也尋不出差異來。因為他們不分上下的，同樣要忍受着痛苦和身體的不安，所以更增加他們集團的革命意識。

在我以為永遠不能忘的驚異，就是我所訪問過的先鋒隊。他們在紅軍裏有一個親熱的外號叫做「小紅鬼」，差不多人人都喜歡他們，每一個紮營的地方，都有這麼一隊由共產主義青年團所組織的「小紅鬼」。他們的年紀都在十二至十六七歲之間，甚麼地方的人都有。他們有的參加過這八千英里的長征，有的參加過去年向山西的出動。他們的職務是傳令，演劇，號兵，無線電報員，挑水伙，宣



傳員，馬夫，看護，及書記等。

我記得在甘肅遇見過一個小鬼，他們都叫他山西娃娃，他是山西洪洞縣附近城鎮的一個學徒，當紅軍來到的時候，他糾合三個小夥計一起跳牆出去加入紅軍裏。他爲什麼決定加入紅軍我却不知道，但閻錫山的反共宣傳和年長人的勸誡，對他們實在是適得其反。當我問他爲什麼要加入紅軍？他說：「紅軍是爲貧民而戰。紅軍是抗日的軍隊。爲什麼別人不可以加入紅軍呢？」像他這樣加入紅軍的人還多着呢。

和這小孩成個對照，我在甘肅那個鎮裏還見過一個紅軍的老人，也是從山西來的。我遇見他的時候，他在紅軍裏當一名馬夫，他表示着不大願意幹這職務，他想到前線去，但那軍官告訴他這職務也很重要，他祇好樂於從命了。我問他爲什麼喜歡紅軍，他從袋裏掏出一個日記本來，很驕傲的眩示給我。那小本有他自己寫的二三百字。他說「我在山西活了六十四年，也沒有人肯找麻煩來教給我認字，我入紅軍祇有半年光景，你看，我現在學的怎麼樣。」由此看來，怪不得紅軍去年向山西出動一次，便招募來了一萬五千個新的同志。

在紅軍裏，我遇見過幾個基督教的學生。我遇過一個會說英語的中國人，他從前當過基督教的牧師。我在甯夏遇見一個紅軍的士兵，他從前在山西一個基督教醫院藥房裏作事。他告訴我現在還是一個基督徒，他每天祈禱也沒有人來干涉他，那些「小鬼」因此叫他管作「禮拜堂。」我見他

的時候，他當一個理髮匠，他也似乎不大滿意這低微的地位。他把衣服撩起來，指着兩處他最近在火線上所受的榴散彈傷痕給我看。他說他對於從前基督徒的顧主仍然忠誠，因為他們並不對他加入紅軍，而且告訴他和他的朋友，說紅軍都是些好人。他告訴我山西基督教醫院裏兩個美國大夫的名字，請我寫信告訴他們，說他現在很好而且很快樂，待革命完成以後，他還願意回到那醫院裏服務。我很不願意和那『禮拜堂』分別。他是一個好人，好理髮匠，而且是基督的忠實信徒。

在紅軍裏，我遇見過回教人和裸裸。我遇見過從奴隸式的學生那裏逃亡出來的青年，我也遇見過爲紅軍解放的少女奴婢。他們在紅軍裏作看護，縫作制服或者作婦女團體的組織者。她們都很勞碌，並且總是歌唱着。

我遇見過二十三、四歲的青年，他們參加紅軍，有過十年的作戰經驗了，他們的家鄉，給「白軍」——他們對國民黨軍的稱號——毀滅了，他們的父母，兄弟，姊妹給白軍屠殺了。我見過徐海東，他是紅軍裏的著名軍官，他原是湖北的一個密工，後來作了鄂豫遊擊隊的領袖，漸漸變成一枝龐大的紅軍。徐告訴我，他的湖北家族有六十六個人給國民黨的軍官下令處死了，現在生存的祇有他和他一個同族弟兄。

由此看來，你也許會問共產黨爲什麼能誠意的要求國民黨及其他政黨成立一個聯合陣線？他們怎能忘却十年來所受的戰爭與痛苦？他們怎能忘却一九二七年國共分家時所感受的悲憤？

共產黨對付南京政府的政策是什麼？我且把我去年九月二十在安保會見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的一段談話引用出來作答案吧。

我問毛澤東：「請你給我說明一下，共產黨的聯合戰線政策和對國民黨政府態度的轉變好麼？」毛答：「我們最近宣言中所公佈的政策是受了三個主要因素的影響：（該宣言在八月二十五日由保安向國民黨發出——施諾）

第一是日本侵略的嚴重：這種侵略一天比一天的加緊，致使中國各種力量必須聯合以對抗之，除掉共產黨之外，我們承認中國還有其他的政黨存在，而且，自然其中最有力量的還是國民黨，不同它合作，祇共產黨不足以抵抗日本，南京必須參加對日戰爭，國民黨與共產黨是中國兩個主要政治勢力，如果他們仍然繼續內戰，對於抗日運動是極大的不利。

第二是自從去年（一九三五）八月共產黨發表要求全國各黨聯合，一致對日的宣言以來，雖然國民黨仍然進攻我們，但是我們的建議，已經引起全國民衆廣泛的同情，爲了救國，現在一般國民及許多愛國官吏，都熱望着國共兩黨的重新聯合，大家都盼望結束內戰，因爲不如此，抗日運動是遇着極大阻礙的。

第三是甚至國民黨裏的愛國份子也主張再同共產黨聯合，因爲民族危機的嚴重，南京政府裏面與其自己軍隊中的抗日份子，也都感覺到同我們聯合的必要。

這些是目前中國形勢的主要特點。基於這些特點，我們得詳細的重新考慮民族解放之具體方案。實際上，我們已在最近將這個具體方案提出與國民黨交涉，抗日為我們主張的原則，為了實現這種目的，我們相信必須建立一個民主國的國防政府，它主要的任務是（一）抵抗外敵侵略（二）賦與人民一切公權（三）積極發展國家經濟。

這樣一個綱領，能實現人民目前的願望，一定會得到全國一致的擁護，因此蘇維埃政府贊助成立這樣一個全民的民主政府。

我們贊成一個議會代議制的政府，一個抗日國防政府，一個能援助與保護民衆愛國團體的政府，假如成立了這樣一個政府，中華蘇維埃將變成他的一部，我們要在我們的區域內實現如在中國其他部份內所實行的民主代議制度。

於是我又問：『那就是說，這樣一個政府的法律能同樣的施用在蘇維埃區域內嗎？』  
他答：『是的。』

我又問：『然則現在的蘇維埃法律，尤其是關於土地問題的部分將被廢止了嗎？』  
他答：『假如同南京的聯合戰線成立，這個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

自然，我們知道日本和國內親日份子將要激烈的反對這種綱領，但是中國人民一定會歡迎它，並且我們相信會得到成功，不然，如果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之下，則凡有良心的人，都能知道這是使

中國人民走向滅亡的路子。

我們知道已經有一部分國民黨反對再向日本投降，在民衆中，各階級，軍人，科學家，學生，商人，警察，職工以及在蘇維埃裏，工農都已經自動的組織起來抗日救國團體，同這些團體，我們要盡力的提攜合作，我們希望這樣份子聯合起來，去克服親日派與不遵守孫中山主義的叛徒。我們希望這些份子，能協力來恢復並實現孫中山的基本主張與遺囑，那就是（一）聯合蘇聯及一切以平等對待我之國家，（二）與中國共產黨聯合，（三）保障中國勞動階級之基本利益。我們希望這樣份子，能幫助實現孫先生的遺囑，並反抗日本帝國主義。

假如在國民黨裏開展了這樣一個運動，我們預備同它合作並支持它，希望造成一個類似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間的反帝聯合戰線。我們相信這是救中國的唯一辦法，假如這個綱領實現，我們絲毫不必懼怕日本，日本帝國主義不能戰勝這個真實團結的，武裝的，與有組織的中國人民。

這似乎是一篇很清楚很坦白的談話。不過有人認爲這種提議只是欺騙國民黨放棄政權的一種詭計。我看這倒太幼稚了——因爲共黨既不能祇用言辭而使南京聽信，南京也不會這樣的易欺，使自已成爲一種詐術的犧牲品。我想這種恐懼是不必要的，因爲共產黨和國民黨二者對於政治策略都很有經驗，不致輕信魔術。

照我看，國民黨或南京政府放棄任何權力給反對黨，是沒有什麼可能性，除非他在全國的嚴重

壓迫之下，或除非絕對的積極要擴充他的政權的基礎以自衛。很顯然的，紅軍和蘇維埃政府只是壓迫南京樹立民主政府的勢力的一部。除非這種要求也受大部武力和非武裝民衆的支持，裝是很難實現的。

無論如何，近來事態的發展表示這種勢力正在動員。此次西安政變提出的要求，和紅軍及蘇維埃政府的要求相符，在根本原則上完全一致：停止內戰，成立代表制民主政府，要求言論自由，釋放政治犯，抵抗外國的侵略。將這個綱領和全國救亡運動的綱領比較，顯出大部非武裝人民也同意這個方案。全國救亡運動雖然遭受了嚴重的鎮壓，過去一年中却變爲很大的勢力了。如果危機照現在的路線發展下去，桂川綏晉冀魯諸省的意見也似乎要偏重贊成停止內戰，在中國開始民族和民主的復興的新時代。

西北事變爆發的根本原因，照我的意見，可以總括之如下：

- 一、厭惡十年來的內戰，不忍坐視國家被日分割。「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是西北的一致口號。
- 二、對於南京經敵六年殘酷的侵略，而不作抗戰的政策不滿。試看中國近年的損失，領土爲全國五分之一，鐵路爲百分四十一，未墾土地爲百分八十五，鐵礦爲百分八十，最好的森林地域爲百分之三十七，國家出口貿易爲百分之四十一——許多人感到：只能損失，就是將來若干年南京怎樣建設，都不足彌補。

三、對於南京鎮壓應民族危機的需要而起來的愛國民衆運動的不滿。西北和這個愛國的民衆運動保持密切的關係。當日本作新的進攻，要侵佔綏北的時候，不幸南京竟同意日本的要求，鎮壓反日運動，曾用武力和流氓手段破壞上海日沙廠的中國工人罷工。這次罷工含有愛國的和經濟的性質，來回答在綏遠的新的挑戰。南京同樣屈服在日本的這次罷工含有愛國的和經濟的性質，來回答在綏遠的新的挑戰。南京同樣屈服在日本的要求下，應允鎮壓青島的罷工工人。並且在一些喪權辱國的條約下，應允鎮壓任何將來在該市日本工廠的罷工——這個不幸事件正發生在西北事變的時候。

不過南京這時候，最刺激國民感情的事，或者是在上海逮捕全國知名的七個愛國領袖，這些人的影響已經深入所有中國抗日的各階層，包括武裝和非武裝的羣衆。同時十四種全國有力的雜誌，也一下子給封閉了。

四、或者比表面上顯露的更深刻的一個原因，是不信任南京政府外交政策的普遍的擴大，一般都認爲南京預知德意日所進行的法西斯大同盟，而不能公開的青難反對。在西北和中國其他地方有一種信念，以爲事實上南京已經默認參加這個同盟，和日本成立反共協定。當德意這兩個法西斯國家事實上承認東北成爲日本的「滿洲國」以後，而南京仍有多數的德意顧問，這是東北軍所不能忍受的。所以張學良文日通電中提到『近來國際情勢豹變，相互勾結，以我國家民族爲犧牲。』

和日本進攻綏遠同時，對西北共黨第六次最後圍剿的準備也都作好了，這足以證明南京繼續內戰的決心，而是東北軍堅決反對的。因為東北是在第一次圍剿時失掉的，侵略上海在另外一次，熱河失陷在又一次，而冀東察北是在繼續的剿共的戰事中失掉的。因此我們相信，在這次新的剿共戰爭中，綏遠必定要失掉的。

不過所有這些，祇是此次西安事變及全中國對它同情的背景的一小部分。整個事情在這裏說得太複雜了。為避免過於簡略的危險，我儘已所知，述說一下，俾大家明瞭此事。

在基礎上西安事件是代表中國兩種相對立的勢力的尖銳的裂痕，這兩種勢力的對立比休戚相關的將軍們的命運還來得急切。其中一種勢力是構成南京政府基本的力量，是右傾的，他們恐懼任何民衆運動，反對民主，反對和共產黨妥協及致任何足以威脅獨裁霸權的政敵進行合作，假如政敵逼迫過甚的時候，他們有和德意等法西斯國家聯合的趨勢，最極端的少數派，甚至能聯合日本，進攻中國紅軍，再進攻蘇聯。

另外一個勢力，就是對委員長施行兵諫背後的勢力，代表中國最急進的反日分子。它要求立即對日作戰，所以他們擁護各黨各派各團體各軍隊的「聯合戰線」主張，停止一切內戰，開放黨禁，實行民主政治來擴大南京政府的基礎，他們要求實現農業改良，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組織民衆，武裝民衆。一個民衆運動，在這樣意義上是沒有什麼可怕的。



第二派還受抗日軍隊，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學生運動，在野政黨，紅軍等有力的支持。它顯然也希望以後從英國美國法國蘇聯得到支持，成爲世界民主陣線的一部。楊虎城演講說『我們的運動和世界民主和平陣線是不可分離的。』第一派，至少當它很活躍的反抗第二派的勢力的時候，自然受日本和極反對中國親蘇參加民主戰線的國家的支持。

由西北向南京提出的八項要求中，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這次西北運動是兩派中的那一派：  
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

二、停止一切內戰。

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

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五、開放民衆愛國運動。

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切實遵行總理遺囑，要求與蘇聯同盟，和共產黨合作，保護農工。

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這些表示大部分有政治意識的中國人的良心的要求，據我看來，這似乎是自一九三一以後，對於中國政治有認識的人們中，很少人會反對的一種事實。

在這局勢中，共產黨站在什麼立場？誰都知的他們完全支持抗日運動，甚至於改換他們的軍隊的名稱爲「抗日先鋒紅軍」。由演講和廣播中得知，西安的領袖提到四種勢力聯合抗日，這四種勢力是，西北軍，東北軍，抗日紅軍和人民的羣衆運動——這就是政治上，軍事上，受了訓練，武裝起來的西北成千成萬的工人和農人以及最近幾個月集到西安作政治工作的學生和兵士。

並且紅軍和所有抗日軍隊一樣，反對繼續內戰。爲了反對南京政府的武力統一中國政策，他們要求最要緊的，是給南京適足的壓力以實現在堅固的民族的，前進的，民主的基礎上的和平統一。在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聯合簽名的通電中，有它給南京的提議如下。

「自西安提出抗日綱領以後，全國震動，南京的「安內而後攘外」政策不能再續。平心而論，西安諸公愛國熱心，實諸首列。其主張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諸公，步驟較緩。可是除親日份子外，亦非毫無抗日者，能發動內戰，當非心願。以目前大勢，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救國，堅持內戰，無非自速其亡！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本黨本政府謹向雙方提出如下建議：

一、雙方軍隊暫以潼關爲界，南京軍隊勿向潼關進攻，西安抗日軍亦暫止甘陝境內，聽候和平會議決定。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會議，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並通知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派代表參加。本黨本政府亦準備代表參加。

三、在和平會議前，由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先提出抗日救亡草案，並討論蔣介石先生處置問題，但基本綱領，應是團結全國，反對一切內戰，一致抗日。

四、會議地址暫定在南京。

上述建議，實爲解決目前緊急關頭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諸公，望立即決定國策，以免值此國家混亂中，日寇竟乘虛而入也！並望全國人民各黨各派，立即督促當局，召集和平會議，討論一定國策，共赴國難！』

因爲我相信，現在的局勢，雖然一定有它的喜劇的外表，實際却藏有中國內政外交政策的最深刻的問題，我希望我已經能給你們談出一些緣因。這或者是一九二七年以來這國家所遇到的最大的危機。我沒有法子將這題目講盡了。我只希望我沒有使我的聽衆感到疲倦，謝謝諸位。（In English）

SHOW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北平協和教會演講辭）

50101

C  
9.5

S024

0 . 0 0